

太原理工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山西近代天主教堂建筑考察之南境教区

姓名：李瑾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建筑技术科学

指导教师：王瑛

20060501

山西近代天主教堂建筑考察之南境教区^①

摘 要

随着天主教进入山西，带来一种新的宗教建筑类型——天主教堂建筑。近代山西天主教堂是山西近代建筑中较早出现的西方建筑类型，在传播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当时当地的社会历史背景、民族文化以及地理位置、民俗传统等各方面的影响，产生不同程度的异化，从而发展出带有地方传统建筑特色的本土化教堂建筑，这是西方建筑文化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实证，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本文以近代山西天主教堂为研究对象，以山西南境教区的主要教堂作为实例进行分析。从近代山西天主教的发展历程及山西南境教区的教堂分布入手，寻找天主教堂建筑发展的背景资料；在此基础上，论文以时间为线索，论述在不同时期的历史背景下，教堂建筑在山西南境的发展趋势，以及由此而出现不同时期的教堂建筑形式；论文还具体分析了山西南境教区的重要建筑实例，并对这些实例进行分类总结；以此为基础，对比了山西教堂建筑与西方教堂建筑的异同，揭示了山西教堂建筑的本土化特色。

山西近代天主教堂的研究揭示了西方宗教文化和西方建筑文化在山西的传播和融合过程，为研究山西地区中西方建筑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思考。另外，通过调查与分析现状，做基础性的工作汇总，对于今后如何保护、

^①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项目批准号: 50578100)
山西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项目编号: 20041062)

改造和利用山西近代建筑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山西建筑 近代天主教堂 南境教区 中西融合

MODERN CATHOLIC CHURCHES IN SOUTHERN SHANXI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Catholic Church came into Shanxi, it had brought a new spiritual architecture, church. As the earliest European architecture, catholic churches in Shanxi area built from mid-19th century on, inevitably would have influenced by society, culture, region and folklore in location, came into being different changes in style, resulted in a vernacular church type, which combined the western spiritual architectural characteristic and the eastern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characteristic. Shanxi's modern catholic churches, which are very valuable historical culture, are real demonstrations of the western and the eastern architectural culture contacting to merging.

This paper researches into the modern catholic churches in Shanxi,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churches in Shanxi southern parish. It started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background materials about the progress of catholic churches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Catholic Church in Shanxi and location of churches in Shanxi southern parish. Following, as time to a clue, it discusses the evolution current and characteristic of Shanxi churches in different period of mid-19th century. Further, on the basis of the churches' forms in Shanxi southern parish, the paper tries to find out vernacular features of Shanxi churches by contrasting the western and Shanxi's catholic churches. Finally, this paper sums up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s and changes of the churches in Shanxi. Further more, it makes clear the value of modern catholic churches in Shanxi.

It has especial value to study the modern catholic churches in Shanxi that can help us to find out the west culture spread and communion with Chinese culture in Shanxi. In addition, it can be a reference in some ways to protect and reconstruct modern buildings by means of this investigation and collection.

KEY WORDS: Shanxi architecture, modern catholic churches, Shanxi southern parish, combination Chinese and western building styles

声 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科研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 李瑾 日期： 2006.5

关于学位论文使用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太原理工大学有关保管、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其中包括：①学校有权保管、并向有关部门送交学位论文的原件与复印件；②学校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复制手段复制并保存学位论文；③学校可允许学位论文被查阅或借阅；④学校可以学术交流为目的，复制赠送和交换学位论文；⑤学校可以公布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
容（保密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

签 名： 李瑾 日期： 2006.5

导师签名： 王 璞 日期： 2006.5

第一章 绪论

近代建筑是城市建筑发展史中不可缺失的一环，它们不仅记载着历史的进程，还展示了人类技术的飞跃进步。中国近代建筑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历史时期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近代建筑的研究是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代建筑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其产生和发展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在中国建筑历史中，近代建筑处于承上启下、新老并存的过渡阶段。近代建筑既是传统建筑的延续，又是当代建筑的开端；既有传统的表现，又有外来形式的植入，还有对新形式的探索。因此，对近代建筑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当代建筑设计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1 研究的内容和研究的对象

本文研究的内容是中国近代时期从 1840-1949 年的山西南部地区的天主教會的教堂建筑，其产生的文化背景、以及外来教堂建筑形式的本土化特色。以山西晋南——即山西南境教区的近代天主教堂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它们的历史文化背景、发展状况、建筑特点作基础的研究，由此展示出山西近代天主教堂受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在晋南大地上的发展与演变，产生出外来建筑形态本土化的特点，是山西近代建筑遗产中具有重要价值的组成部分。

关于山西南境教区的定义，严格的说，南境教区是指 1890 年，罗马教廷将山西划分为南北境教区其中的南境教区。但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南境教区又多次划分更迭，最终划分为三大教区：潞安教区，洪洞教区，绛州教区。本论文所指南境教区研究的范围是：在地域上，以南境教区 1890 年的划分为界，在时间上，是指从 1840 ——1949 年。

以山西南境教区的近代天主堂建筑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不仅是对山西南境教堂建筑的资料收集介绍，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其历史沿革和发展状况的研究考察，归纳总结山西南境天主教堂的建筑特征，从而发现它所融入的地方化因素，笔者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从建筑历史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对比和评价，得出自己的结论。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在中国的外来建筑形式中,最早出现的形式之一就是教堂建筑。中国教堂建筑是在特定背景条件下出现的一种植入形式的建筑,是外来文化的产物。作为中国近代建筑的早期建筑形式,教堂建筑是反映西方建筑文化传入中国的重要实证。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山西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也正说明它的重要性。

作为宗教文化传播的先行者,天主教是较早进入山西的西方宗教,教堂建筑形式也成为山西省最早的西方建筑形式之一。山西天主教堂主要是清末时期由方济各教会传入的一种建筑形式,在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影响下,教堂建筑或多或少融入了山西地区的本土化建筑特色,形成了独特的建筑风格,既有别于西方教堂,又不同于山西传统建筑,在这种微妙的建筑形式变化中,突出表现了西式教堂本土化的特点。这是山西天主教堂的特殊性所在,它对当地的建造技术、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对当代建筑的创作具有启发意义。

可以说,天主教堂建筑——这种纯粹舶来物的建筑类型,其中融入了中华本土文化因素,通过对它们的研究能够更清晰的展示西方建筑文化是如何在中国生根、发芽、传播,成为其它近代建筑研究的基石;而且,通过调查与分析现状,做基础性的工作汇总,对于今后如何保护、改造和利用山西近代建筑提供参考。

1.3 研究的现状

中国近代教堂建筑的研究在外省部分地区已经有了很大的成果,尤其在近几年中出现一批针对教堂建筑的专门性论文研究,如同济大学倪群的硕士论文《上海教堂建筑研究》(1989);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胡婕的硕士论文《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陕西宗教建筑——教堂建筑研究》(2003)、范飞的硕士论文《开封理事厅教堂研究》(2004);重庆大学黄瑶的硕士论文《重庆近代天主教堂建筑研究》(2003);西南交通大学曹伦的硕士论文《近代川西天主教教堂建筑》(2003)等等。

有关山西近代教堂建筑方面的论述,散见于宗教杂志、地方文献中的一些介绍性文章,个别地方性教会资料等,大多以宗教或旅游的角度宣传教堂建筑,据笔者所查阅的资料来看,从建筑角度上对山西天主教堂的系统研究还很少。基于这种情况,笔者以此为研究对象,希望能在山西近代教堂建筑研究方面有所贡献。

1.4 研究的方法

本文从多种学科的角度,以介绍传教士入晋着手,从历史方面论述天主教的产生、发展和教区的更迭过程,分析教堂建筑的历史沿革。以全国以及当地的社会进程、人们的宗教信仰变化为依据论述天主教在当地的建筑型制变化。

本文运用了对比的研究方法,把山西近代教堂与相同和不同时期西方教堂作对比。由于复杂的历史背景、各个地区不尽相同的民俗风情以及各个教区国籍不同的传教士的影响,使得山西教堂建筑在形式风格、渊源以及演变等方面呈现相互交错的现象。这样,单纯以时间为线索来研究,就无法辨识教堂建筑在西方型制与地方传统的融合,采用与西方原型教堂作对比,可以更清晰明了山西近代教堂自身的特点。本文从建筑形式、平面功能布局、结构造型、细部装饰等几个方面进行对比,并且从外部和内部因素寻找、分析产生这种本土化建筑的原因。

另外,本文运用了实证法,从山西地区各个教会区,选取较典型的教堂——主要以山西南部的教堂作为实测与分析对象,并结合当地的文献和档案资料进行研究。虽然山西地区属于黄土高原区域,但由于地理条件、环境气候的影响,不同地区的建筑类型、建筑风格等也不尽相同,所以,表现在西式教堂的本土化特色上也有细微的变化。采用实证法,通过实地勘查,获取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目睹教堂建筑与当地风土民情以及建筑的关系,从而使论述更具说服力。

1.5 论文的组织结构

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部分,概括介绍了研究的内容,目的意义,现状、方法等。第二部分是第二章到第五章,为论文的主体部分:首先论述性的介绍天主教传入山西的背景,以及山西南境教区的教堂分布,由此展开。随后主要的论述是以两条相互对应的链条为基础来评价教堂建筑的,一条是历史事件的叙述,一条是建筑形式的划分。其次以时间为线索,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教堂建筑在山西南境的发展趋势,由此出现不同时期的教堂建筑的形式;然后,以建筑形式进行分析,尽量按历史的时段、建筑风格归类,对于特殊的例子给予具体分析说明,这样使教堂建筑和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明确,一目了然。最后对比了山西教堂建筑与西方教堂建筑的异同,揭示山西建筑的本土化特色。第三部分是结束语,总结归纳全文,并阐述了教堂建筑的价值和魅力。

第二章 天主教在山西的传播及山西南境教堂分布情况

外来西方建筑文化的早期殖入形式之一是教堂建筑。天主教作为最早进入山西的西方宗教,直接冲击着当地的传统文化,并由此而产生了新的建筑类型——山西天主教堂建筑。

天主教是基督教的一个主要派别。基督教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诞生于巴勒斯坦地区,源于犹太教。基督教是以耶稣基督传扬的思想为基础的宗教信仰和实践体系。它有许多教派组成,天主教与东正教、基督教(也称新教)并称为基督教的三大教派。天主教也称“公教”,这个字起源于希腊文 *katholike ekklesia*,意思是“公教会”。由于天主教是在罗马教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故也称罗马公教(Roman Catholicism),在我国又称为“加特里教”。^①

2.1 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历史回顾

据中国主教刚恒毅(Costantini)的观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史分为四个时期:自天主教的一个分支——景教(又称“聂斯多略派”)到达中国(7世纪),至若望·孟高维诺(Jean de Montecorvino)抵中国(12世纪末),为第一期;自孟高维诺到中国,至1368年,即元朝末年为第二期;自耶稣会神父抵中国(16世纪末),至中国首批六位主教之祝圣(1926年),为第三期;自成立中国圣统教会至今,为第四期。^②

天主教传入中国可谓历史悠久。据资料显示,在唐朝年间(公元600多年),景教传入中国陕西,但经过二百年左右消亡。随后,在十三世纪七十年代,意大利籍的方济各会士孟特高维诺来华,经过努力在北京创立了中国天主教史上的第一个教区。但在元朝覆灭之后,天主教再次如潮水一般迅速退去了。天主教这两次传入中国,并未造成深

^① 十一世纪五十年代(1054年)以前,凡信仰基督者,通称为基督徒。教会称为基督教会(拉丁文 *Chris Tianiomus*)。1054年基督教东西两方分裂后,西方教会自称“公教”(拉丁文 *Ecclesia Catholica*),也即天主教。东方教会自称“正教”(拉丁文 *Ecclesia Orthodoxa*),也即东正教。十六世纪发生了宗教改革运动,又从天主教内产生了与罗马教皇相抗衡的“抗罗宗”(拉丁文 *Protestantes*),也即“新教”。以上三种后世史书上称为基督教三大教派。三大教派,在外文中,各有专名,一目了然。但在我国,由于新教俗称耶稣教,又称基督教,因此基督教一词,在我国就有了两个涵义:一指世界性公认的基督教各派总称;二指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产生的新教。早在东西方教会分裂之前,当时没有“公教”或天主教这个名词,通称为基督教,故为“是一个由基督教分裂出去的教派”,而不能为其它。

^② 刚恒毅,孙茂学译《基督宗教艺术在中国》。

远影响，也未留下已知的任何教堂遗迹。

进入十六世纪后，随着欧亚航路的发现，葡萄牙传教士在澳门获得对华传教的立足点。1582年意大利籍耶稣会的利玛窦（Matteo Ricci）进入中国。以他为首的传教士聚集在北京，他们设法迎合了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传统观念，以传播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为主要方法，向中国的上层人士推行天主教，并经过官员把天主教向中国内陆传播。在明朝政府的准许和资助下，他们在各地兴建了最早的一批天主教堂。

至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相当兴盛，到1701年，康熙四十年，全国已经有229座教堂，与1664年的统计相比，教堂的数量翻了一番。中国教徒达到30万。^①

2.2 天主教在晋的传入与早期发展

天主教进入山西，据史料记载始于1620年。万历末年山西绛州乡试解元韩霖^②在京为官，与徐光启相交，遂领洗入教。之后韩霖的兄弟韩云、韩露和同乡绅士段袞（字九章）在北京入教，他们返乡时，将天主教带回绛州，此为山西天主教的起始。韩、段于明神宗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邀意大利耶稣会教士艾儒略（Jules Aleni）到绛州（今新绛县）传教，他是第一位进入山西的传教者。^③天主教遂传入山西。

1624年，比利时籍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qus Liguault）由开封来山西，在绛州定居。同年，段袞在他的家乡——段家庄建教堂一座，该堂是绛州教区乃至山西天主教史上第一座具有中国古典建筑风格的教堂，也是中国教会第一座由教徒自发捐献建立的教堂^④，从目前来看，因各种原因，已经无从考证。

此后，在天启五年（1625），意大利人高一志^⑤（Alphonsus Vagnoni）入绛州传教。高

① 引自晏可佳，《中国天主教简史》，第93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

② 韩霖，字雨公，绛州人。天启元年（1621）举人。善诗文，工书法，家藏书数万卷。在北京信奉天主教，洗名多默。韩霖在家乡有较高的威望，高一志在绛州开教，得韩霖的帮助很多。其家人在他的影响下，都受洗入教。著有《铎》书，引述教理与教会书籍颇多。又与张庚合著《圣教信证》，是我国第一部记述天主教传教士士略与著作的书。

③ 引自马良等，天主教长治教区简史（内部资料），第9页，教友生活编辑部，1997年12月。另一说法是段袞与韩霖同时入教，随后，他们邀请艾儒略到绛州，并为其家属受洗，其中有韩云、韩露。见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第四十六卷，第367页，中华书局，1997年。

④ 引自段春生，九原山麓的段家庄教会，2005。

⑤ 高一志，原名王丰肃，他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来华传教于广州韶州、南京一带。万历四十四年因在南京建立西式教堂，高竖十字架而激起民愤，被逐至澳门。在1625年，来山西传教直到去世，他平生著有二十五部专著，在文学、历史、哲学、信理、伦理、教育、社会、政治、自然科学诸领域均有卓越的建树。他的学术见解和思想火花对于中国教会的信仰传递和教育理念都有重要的影响。

一志神父到绛州后在韩霖、段袞的庇护下，以西学修身，取得绛州雷刺史的支持，教务兴盛。1625年，绛州教徒有200余人，其中有举贡生员80余人，到崇祯三年(1630)绛州教徒已经激增至2000余人。崇祯四年(1631)，高一志又应蒲州大学士韩圻之邀，到蒲州传教，建立了教堂。^①

此后不久，天主教在绛州已经初具规模，后来因为李自成率军自四川东上途经这里时，焚烧教堂，致使该处教会一度处于瘫痪。到明朝灭亡的1640年，山西以绛州为中心的教徒已达8000余名，建有大小教堂50余处。^②

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罗马教廷在中国建立了北京、南京两大教区，同时另批了九个代牧区^③，山西占其一，归耶稣会士管理。山西首任代牧主教是意大利籍耶稣会教士张安当(Antonius Posateri)，当时，山西全省教徒约三千左右，分属于太原、绛州两个堂口。从1716年(康熙55年)至1844年(道光24年)，山西和陕西两省教区合二为一，称为山陕教区，归方济各会士管理。其间，在“中国礼仪之争”^④的问题上，引发了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激烈冲突的开端。1724年，雍正正式发出禁教令。山陕教区时间约128年，其中有124年是在清政府禁教时期。当时教会处于极不自由阶段，教堂被封，教产被没收，教士被驱逐，一切宗教活动都不能公开进行，遂转入地下，教会呈现大倒退现象。^⑤

2.3 近代天主教在山西的传播

2.3.1 近代天主教在山西的发展历程

鸦片战争后，随着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道光帝被迫废弛了禁教令。天主教复又从地下走出，获得了公开传教的自由。1844年2月，山陕教区改组，两省

① 段春生，山西开教宗徒高一志神父事略，2005年。

② 同上。

③ 代牧区，即非正统区。中国有正统教区，始于1946年罗马教廷在中国建立“圣统制”。通过“圣统制”的建立，将原来的代牧区改变为正统主教区。多年来，中国教会列为传教区教会，统属于罗马教廷传信部。各教区所有主教均为代牧性质。以它地主教名衔管理中国某一教区。论教权，正统与代牧是一样的，名不同而实权同。

④ 随着17世纪天主教各主要修会先后进入中国传教，在修会内部、修会之间，对于中国的主流文化即儒家文化的宗教性在认识上产生分歧，并逐渐发生了激烈争论。这场争论历史上称为“中国礼仪之争”。分歧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是中国人的祭祖祭孔活动，其性质究竟属于宗教还是礼俗；二是造物主的译名究竟应该用何种译名。

⑤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第四十六卷，第368页，中华书局，1997年。

又重新划分为各自独立的教区。首任山西教区主教为意大利人方济各会教士杜嘉弼 (Gabriel Griogli)。当时全省教徒共有七、八千人, 中外籍神父 20 名。^①

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 传教士逐渐偏离宗教的本源, 插手于地方政治事务, 使得平民与教会之间的冲突日益频繁, 矛盾积怨亦深。在 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中, 山西天主教遭受了重大的打击。但随后, 巨额的庚子赔款使山西的天主教如野火过后的草原迅速壮大起来。天主教堂分布在城市村镇、偏远山区、穷乡僻壤, 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建立起来。二十世纪初期成为山西天主教发展的黄金时期。

战争爆发的动荡时期, 天主教借收容难民之际, 保护了部分群众, 也发展了教徒, 扩大了影响。但在此期间, 教堂建筑的发展基本处于停滞阶段。新中国建立初, 山西天主教徒总数为 115098 人。^②

2.3.2 在晋天主教的修会和传教士

天主教的教堂形式和传教方式同它的传播组织——天主教修会有密切的联系, 受到其宗教传统和背景文化的影响。山西境内的天主教从 1844 年开始, 在近代这一时期大部分时间是由方济各会管理。方济各会^③, 它的字面意思是小兄弟会, 这个修会主要宗旨是确保教会的统一和权力, 评击各种异端的活动, 要求会士学习耶稣的谦和与节欲生活, 宣扬“清贫福音”, 要教徒安于贫困, 不要参加反教会的活动和社会运动。在中国, 方济各会是一支主要的传教力量, 管辖 27 个教区, 分布在山东、陕西、湖南、湖北、甘肃等地。

近代期间, 1890 年之前整个山西教区是意大利方济各教士管理, 随后的划分, 北境教区由意大利方济各教士管理, 南境教区是由荷兰籍的方济各会士管辖。另外, 1922 年, 大同教区建立, 由比利时圣母圣心会传教士管理, 1926 年, 朔县教区成立, 由德国方济各会教士管理。所以, 在山西天主教的传播过程中, 意大利和荷兰的方济各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代表不同国家的修会是以本国的利益出发的, 所以在教堂式样的选择上, 更多的是以本国的教堂为蓝本而建。山西太原教区的教堂建筑在意籍教士的管理之下, 有的教堂

①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 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 第四十六卷, 第 368 页, 中华书局, 199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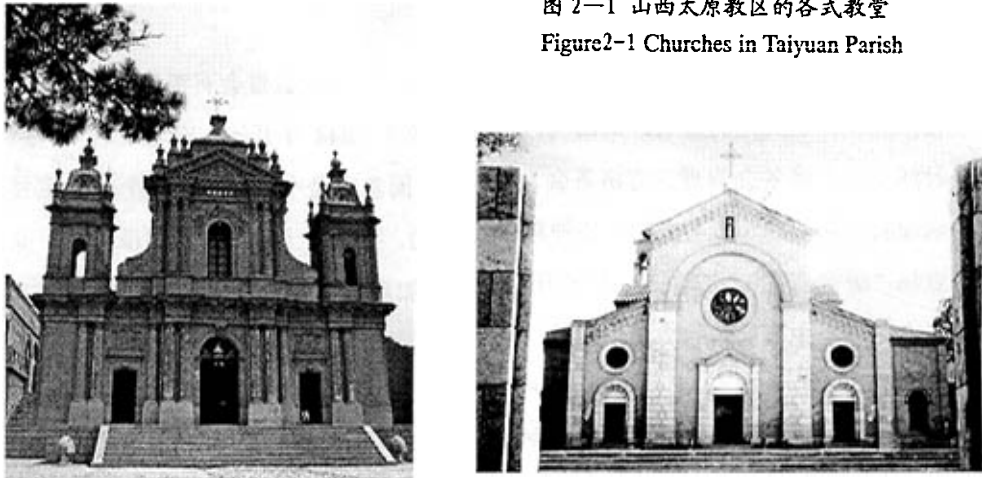
② 同上, 第 2 页。

③ 即耶稣多明我会, 是天主教三大修会之一, 12 世纪初, 由意大利阿西西城的圣方济各创立。

式样采用巴洛克和罗马风模式，像太原天主总堂，阪寺山圣母堂；有的采用带哥特元素符号等的几种混合式样，像太原圪窰沟天主堂，呈现出独特的异域化的西式教堂，尤以意大利式巴洛克风情最为代表性（图 2—1）。



图 2—1 山西太原教区的各式教堂
Figure 2-1 Churches in Taiyuan Parish



荷兰的教堂建筑更多受到欧洲建筑主流法国的影响，采用哥特教堂样式。在荷籍教士管理下的南境教区的教堂建筑就是以哥特式风格为主要表达方式的几种风格混和的模式，像新绛天主总堂，南天贡天主堂等（见第四章）。

整个山西的教堂建筑大多是在外籍神父的主持下修建的，一方面，他们受到本国宗教建筑理念的影响，在山西主持修建的教堂风格上略有差异；另一方面，这些神父本人的文化背景和宗教性格等对教堂建筑也有一定的影响。

在这些天主教徒占主要比例的国家里，人们的宗教观念根深蒂固。所以来山西的这些传教士也恪守着传统的理念。在一些近代历史事件中，大部分外籍传教士的表现

一方面同情中国难民，以自己的能力救济，帮助难民；一方面则置身度外，不参与，不赞成战争。这些传教士的思想行为，能够看出，他们遵循的是传统的天主教信念，在教堂建筑式样的选择上，内心中是以传统西式教堂建筑为主导地位的。

近代山西天主教的主教名单

附表 2-1

| 姓名 | 国籍 | 在任时间 | 备注 | 教区 |
|-----|-----|-----------|-----------------|-----------------------|
| 杜嘉弼 | 意大利 | 1845~1870 | | 山西教区 (1844~1890年) |
| 江类思 | 意大利 | 1870~1890 | | |
| 艾士杰 | 意大利 | 1890~1900 | 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杀 | 山西北境教区 (1890~1932) |
| 凤朝瑞 | 意大利 | 1901~1910 | | |
| 希贤 | 意大利 | 1910~1916 | | |
| 凤朝瑞 | 意大利 | 1916~1940 | | |
| 李路加 | 意大利 | 1940~1952 | 1952年被驱逐 | 太原教区 |
| 高东升 | 比利时 | 1923~1931 | 第一任 | 大同教区 (1922年成立) |
| 陈国砥 | 中国 | 1926~1930 | 第一任 | 汾阳教区 (1926年成立) |
| 俞广仁 | 德国 | | 第一任 | 朔县教区 (1926年成立) |
| 富济才 | 意大利 | 1932~1952 | 1952年病故 | 榆次教区 (1932年成立) |
| 艾定禄 | 荷兰 | 1890~1891 | | 山西南境教区 (1890~1932) |
| 贺广才 | 荷兰 | 1891~1901 | | |
| 翟守仁 | 荷兰 | 1901~1926 | | |
| 苗其秀 | 荷兰 | 1928~1943 | | 潞安教区 |
| 成玉堂 | 中国 | 1932~1937 | 第一任，1937年病故 | 洪洞教区 (1932年成立) |
| 孔昭明 | 荷兰 | 1936~1954 | 第一任 1954年被驱逐 | 绛州教区 (1936年成立) |

注：外籍教士的外文姓名因缺乏未标注。

2.3.3 山西教区的历史沿革

1890年,罗马教廷将山西划分为北境和南境两教区,至此山西教区解除。北境教区由于主教座堂设在太原,又称太原教区,由意大利籍方济各会士艾士杰(Gregorius Grassi)主教管理,北境教区所管辖地区范围包括太原、大同、汾州、宁武、朔平五府、忻州、代州、永宁、平定、朔州、浑源、应州、保德、苛岚九州,以及阳曲县、榆次等51州县,教徒一万三千余人。南境教区的主教府坐落于潞安,又称潞安教区,首任主教为荷兰籍方济各会士艾定禄(Martinus Poell),南境教区所辖地区范围,包括有潞安、泽州、平阳、蒲州四府,绛州、解州、霍州、隰州、长治、潞城、洪洞等54州县,教徒九千余人。至1900年山西北境教区信徒总数达一万七千余人,中外国神父31人,大小教堂200余座。山西南境教区信徒一万余人。^①

1900年之后,各地教会受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信教者日益增多,教区范围过大,不利于教务的管理,罗马教廷遂将山西南、北境教区划分成若干新的教区。

1922年,荷兰与比利时圣母圣心会传教士与方济格会教士协商,并通报罗马教廷,成立大同教区,将大同、阳高、天镇、浑源、广灵、灵丘6县划归管理,总堂设于大同城内,首任主教为邓维道。1926年从北境教区划出汾阳教区,辖汾阳、孝义、平遥等15县,总堂设于汾阳县城,由中国神职人员管理。当时称之为“国籍教区”。同年,划出朔县教区,所辖朔县、宁武,偏关等15县,由德国方济格会教士管理,首任主教为俞广仁,总堂设于朔县米西马庄村(现新安庄村)。1932年,划榆次、平定、清源等10县为榆次教区,由意大利方济格会教士管辖,首任主教富济才,总堂设于榆次县内。新的太原教区管辖太原、阳曲、五台、定襄、崞县和忻县地区,总堂设在太原。

1932年,山西南境教区把洪洞、临汾、隰县等13县划出,成立洪洞教区,由中国神职人员管理,是本省又一处“国籍教区”,总堂设于洪洞。1936年,山西南境教区又把绛县、稷山、吉县等32县划出,成立绛州教区,由荷兰籍方济格会教士管理,总堂设于绛州。新的潞安教区管辖潞安,屯留、武乡等19县,仍由荷兰籍方济格会教士管理,总堂设于潞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更好地管理教务,山西省天主教爱国会和山西省教务委员会于1982年6月按行政区重新划分了山西的教区,即:太原教区,辖太原市,大同教区,辖大同市;雁北教区,辖雁北地区;晋中教区,辖晋中地区;吕梁教区,辖吕梁地区,

^① 引自郭崇禧,山西天主教简述,第5页,《山西文史资料》第57辑,1988年。

临汾教区，辖临汾地区；运城教区，辖运城地区，长治教区，辖长治市；晋东南教区，辖晋东南地区，忻县教区由于没有常住神甫，直属省教务委员会管辖。^①

2.4 山西南境教区天主教堂的分布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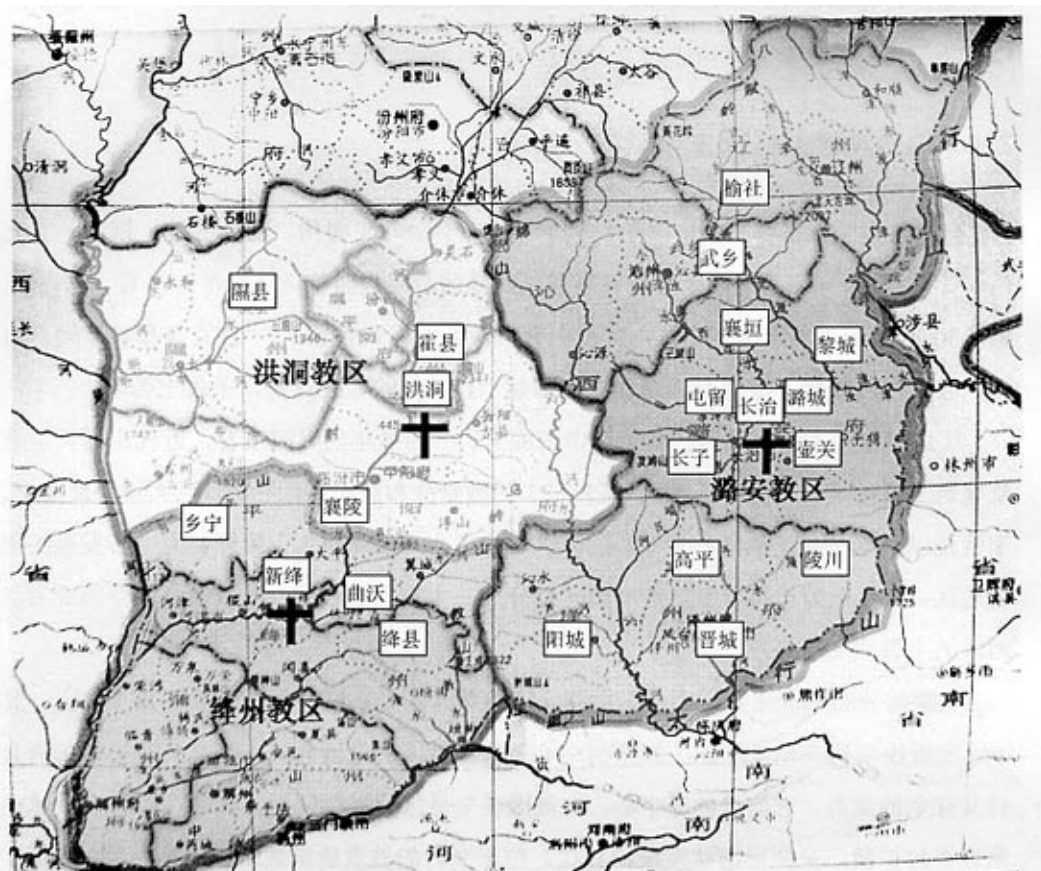
在南境教区范围内，明末清初，教堂建筑主要分布于绛州、蒲县等地，据黄一农先生统计，“明末绛州是山西天主教发展最活跃地区，崇祯四年（1631年）左右，有各式教堂30座，”但“明末清初之乱，官吏中有仇教者毁绛州教堂。”^②在百年禁教期间，山西的教堂发展缓慢，零星有教堂建立，如建于1777年的壶关县安口圣母七苦堂。

从1844年天主教弛禁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一百多年的时间来看，近代山西天主教堂建筑发展迅速。山西南境教区（图2—2）的教堂分布点很多，主要以三大块为最集中，那就是以潞安（今长治市）为中心，以洪洞为中心，以绛州（今新绛）为中心发展的附近地区。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把南境教区划分为三大教区的原因，三个中心点分别成为新教区的主教座堂所在地。

从整体分布情况来看，山西南境教区天主教堂的分布情况大体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主教座堂所在地位于三大教区的中心位置，教区的堂区会口，即有公共祈祷场所合神父住宅的堂点，它们以此为中心，向周围各个县区的城镇辐射，然后在以各个城镇向附近乡村扩散，呈树形网状发展；其二，位于乡村的教堂建筑数量多于在城镇的数量，天主教的教徒最主要的来源就是农村人口，传教士深入偏僻的山区、高地，建立教堂，在丛山之中的教堂，有时会成为教徒朝圣之地，像洪洞教区的韩罗堰教堂，去那里的路途遥远，山路崎岖，但朝圣者依然执著向往。

①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第四十六卷，第368~369页，中华书局，1997年。

② 黄一农，《明清天主教在山西绛州的发展及其反弹——兼论西学、西教的传播网络》，明末以来中西文化交汇研讨会论文，1996年。



注：方框内的城县以及所属村落到目前均有近代教堂分布，十字处为各教区的主教坐堂所在。

图 2-2 清末山西南境教区图
Figure2-2 Shanxi Southern Parish

2.4.1 潞安教区

潞安教区的教堂分布特点：一是教堂多，在南境的三大教区中教堂数量排列首位；二是分布范围较广，尤以长治市与潞城市之间的村庄、城镇集中分布着教堂建筑以及其他附属，像修道院、初级小学、医院等教会建筑用房，这是潞安教区的中心传教区。

据统计，潞安教区在1938年前驻有本堂神甫的堂口计26处，即潞安府总堂，潞城县境内马厂、南天贡、高家庄、安阳、张庄、羌城、南关7处。长治县苗村1处，屯留县老军庄、工庄、郭村、半高、良马5处。襄垣县赵家岭、南里堡2处，武乡县上司利、姚家庄、自家庄3处，黎城县黎城、杀棚摊2处，壶关县安口1处，陵川县人和村1处。晋城县

城内1处,阳城县小南岭1处,高平县莱子沟1处等。共管辖较大的祈祷场所79处,即潞安府6处。潞安县20处,长治县8处。屯留县17处,襄垣县9处。武乡县2处。壶关县4处,陵川县3处。黎城县2处,高于县4处,晋城县2处。长子县1处,榆社县1处。^①

2.4.2 洪洞教区

洪洞教区的教堂主要沿着汾河水系的城镇村庄建立,从霍州到洪洞到临汾一线的附近区域,教堂分布较多,其它各县镇零星分布。

在1932年,洪洞教区成立,设洪洞、韩略堰、马牧、霍县杜壁、襄陵黄崖、安泽马家节、隰县西坡底等8个堂口,并设有小修院有小修道院、养老院、育婴堂、经言小学和德雷学校。因教务不断发展,后又增设洪洞马头、灵石静村、蒲县西关、赵城下张端,隰县韩家窑、临汾柴村等6处本堂口。资料显示,仅洪洞县就有教堂27处,分布在全县21个乡镇的96个自然村。洪洞教区主要堂口共有39处。^②

2.4.3 绛州教区

山西天主教的起源就在绛州,今天的新绛县,所以,新绛天主教与罗马教廷有密切联系,坐堂神父直接由罗马教廷调遣,经济上受其援助。绛州教区的教堂多集中教区北部,新绛周边地区分布,早期数量很多,但因战乱和时间因素,存留的教堂不多了,可是有的教堂规模独占鳌头,像新绛安道大教堂闻名中国。

1936年,绛州本堂区晋升为绛州主教教区。除新绛主教座堂外,另设堂口五处,即张庄坡、刘峪、段家庄、北王马、南古交。目前,城关、段家庄、坡里村、刘峪村四个堂口。教徒分布在城关、店头、南社、北张等8个乡镇29个村庄,共有1370人。^③

2.5 小结

天主教在明末传入山西至今,有近四百年了,历史纷纭变更,天主教的发展也在经历着波折起伏。纵观整个近代历史,天主教发展基本上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教义的传

①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第四十六卷,第376页,中华书局,1997年。

② 同上,第381页。

③ 新绛县志编撰委员会,新绛县志,第614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

播不仅通过外籍传教士的努力，还有当地的教徒。像在南境教区的一些村庄，天主教是由参与教堂施工的当地匠人带回来，在建造过程中，他们受感入教，并在他的家乡大力宣扬，如此一来，天主教传播更加迅速。到十九世纪末，教义几乎传遍了山西的各个城镇和村落。庚子赔款之后，天主教发展更加迅猛，有的地区和村镇整个村民都信教，使得天主教成为当地最大的宗教势力。

西方的宗教文化传入山西，从相互接触、碰撞到认可、融合，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历程。明末的耶稣会士进入绛州传教，把天主教义扎根于山西这片土地，他们设法结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传统观念，赢得了当地人的好感，使天主教在山西获得初步发展，但随着清政府对待西方宗教的态度转变，禁教令的颁布让天主教的发展转入低谷，可以说，在这初次接触碰撞中，西方的宗教文化在这里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记，一如还未成长的婴儿。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传教士以傲慢的态度再一次把西方的宗教带入山西，强行推行西式教堂建筑，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的侵蚀，引发了很多冲突，集中体现在教案频繁发生，尤其是 1900 年的庚子教案达到极点。此后，传教活动逐渐采用了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策略，在教堂建筑上，采用中国古典元素作为局部的装饰构件，成为新式建筑的早期尝试。这样的妥协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天主教在山西不断成长，到新中国成立前，已经成为一支很有实力的西方宗教派别。这一段曲折的过程中，虽然有冲突的创伤和遗憾，但也带来了交流的果实与收获。

山西南境教区现存主要教堂列表

附表 2-2

| 序号 | 地区 | 教堂 | 地点 | 建造年代 | 主持神父或建造者 |
|---------|-----|---------------|--------|------------------|---------------|
| 潞安教区的教堂 | | | | | |
| 1 | 长治市 | 高家庄若瑟堂 | 郊区高家庄村 | 1859年 | 富格勒 |
| 2 | 长治市 | 弥额尔堂 | 城区桃园村 | 1901年 | 翟守仁 |
| 3 | 长治市 | 耶稣圣心堂 | 郊区马厂村 | 1879年 | 法有德 |
| 4 | 长治市 | 圣家堂 | 黄碾镇 | 1902年 | |
| 5 | 长治市 | 王村天主堂 | 郊区王村 | 1897年 1912年重建 | 申永福 |
| 6 | 长治县 | 圣母升天堂 | 西苗村 | 1902年 | 翟守仁 |
| 7 | 长子县 | 耶稣君王堂 | 酒村 | 1930年 | 孙亮臣 |
| 8 | 屯留县 | 伯多禄保禄堂 | 老军庄村 | 1901年 | 郑神父 赵晚堂(中) |
| 9 | 屯留县 | 三王来朝堂 | 东李高村 | 1905年 | |
| 10 | 屯留县 | 玛尔定堂 | 郭村 | 1885年 1901年重建 | 常士睿(中) |
| 11 | 屯留县 | 无原罪圣母堂 | 王庄村 | 1908年 | |
| 12 | 潞城市 | 圣母无原罪堂 | 南天贡村 | 1906年 | 柯岚霭 |
| 13 | 潞城市 | 安多尼堂 | 羌城村 | 1883年 1902年重建 | |
| 14 | 壶关县 | 无原罪圣母堂 | 秦家庄村 | 1935年 | |
| 15 | 武乡县 | 西满达陡堂 | 上司村 | 1903年 | 法春荣 |
| 16 | 晋城市 | 大箕小寨玫瑰 圣母堂 | 大箕村 | 1914年 | |
| 17 | 高平市 | 露德圣母堂 | 果则沟村 | 1893年 | 义神父 殷神父 |
| 18 | 陵川县 | 若雅敬堂 | 太和村 | 1902年 | 锡神父 |

| | | | | | |
|---|-----|--------|------|-------|--------|
| 19 | 阳城县 | 小南岭天主堂 | 小南岭 | 1925年 | 曹神父 |
| 洪洞教区的教堂 | | | | | |
| 20 | 洪洞县 | 露德圣母堂 | 庄园村 | 1916年 | 法春荣 |
| 21 | 洪洞县 | 韩罗堰天主堂 | 韩罗堰村 | 1894年 | 范神父 |
| 22 | 洪洞县 | 马牧天主堂 | 马牧村 | 1904年 | |
| 23 | 霍县 | 南杜壁天主堂 | 南杜壁村 | 1900年 | 柯岚霭 |
| 绛州教区的教堂 | | | | | |
| 24 | 新绛县 | 主教座堂 | 城内 | 1936年 | 孔昭明 |
| 25 | 新绛县 | 坡里天主堂 | 坡里村 | 1920年 | 法春荣 |
| 26 | 襄陵县 | 黄崖天主堂 | 黄崖 | 1884年 | |
| 27 | 汾城县 | 南关天主堂 | 城内 | 1918年 | 郭志坚(中) |
| 28 | 乡宁县 | 板头村天主堂 | 板头村 | 1913年 | 苗其秀 |
| 注:主持神父未注明的均为荷兰籍。潞安教区的教堂名录来自《天主教长治教区简史》。 | | | | | |

第三章 近代山西天主教堂建筑的整体概况

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新中国成立，近一百年的近代历史，山西天主教堂随着社会时代的变化而经历着变迁，整体来看，笔者认为教堂建筑的发展进程以 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为划分点，可分为两大部分。1840 年到 1900 年是教堂发展的初期阶段，这一阶段包括早期的建筑形式和出现非正统的西式教堂形式；1900 年到 1949 年是教堂发展的成熟阶段，这一阶段包括 1900 年之前延续的西式教堂形式和中西结合的中国式教堂形式。

以 1900 年为划分点，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的：

第一从教堂保存的情况来划分。在 1900 年义和团运动时，有很多大型的、著名的天主教堂建筑以及附属建筑被毁，留存下来少数教堂，在运动之后，天主教会获得了大量赔款，并且立刻在整个山西，新建和重修了更多的包括教堂在内的教会建筑，大多留存至今；

第二从教堂的建造年代来划分。多数山西天主教堂的建造时间集中在 1900 年到 1920 年之间，在此 1900 年之前的二十多年，天主教因发展的需要，也陆续建造了一批教堂，虽然在义和团运动中焚毁了大部分，但剩余的建筑从损毁残留情况可归为一类，它们大多经过重新修缮或扩建；

第三从教堂的建造风格来划分。留存下来的 1900 年之前的教堂，主要的表现手法还是以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为基础的，只是在立面上夹杂了一些西方教堂建筑的少量元素，这是早期的教堂(图 3-1)，但到十九世纪后三十年，逐渐出现了非正



图 3-1 太原早期天主堂

Figure 3-1 Catholic Church in taiyuan

统的西式化的教堂，这就是教堂发展的初期阶段；在 1900 年之后，大量的新教堂出现，建筑风格就主要是以西方教堂的模式为基础而建造的，后部主体和局部装饰混合了中式元素，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现了中西融合的尝试性教堂，这是教堂发展的成熟阶段；

第四从人们的心理变化和传教士的态度转变来划分。1840年以后,山西许多地方出现了教士的身影,他们带来了完全不同的宗教观念和礼仪习俗,当地的人对此采取的是强烈的排斥心态——不理解、不认同,同样,对于初来乍到的传教士而言,人单势孤,在这种情形下,早期教堂的样式为了避免矛盾升级,也为了宣扬教义,就尽可能多的采取中式风格,到十九世纪后几十年,教会的势力壮大了,出现了非正统的西式化教堂;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山西人民遭受旱灾和动乱的折磨,天主教采取了赈灾和利益吸引的策略,并保护教徒,做出相对有益的举动,人们带着感激和难以形容的卑下心情接受了天主教,成为教徒,而传教士获得巨额赔款,在特权的保护下,开始肆无忌惮的建造大量西式教堂,在二十世纪二十年达到了高峰,随后不久,社会上发起了反对基督文化的运动,中西融合的教堂在天主教“本土化”的倡导下出现了。

基于以上原因,教堂建筑发展的两部分进程中,建筑形式呈现出在1900年前后重叠的状态,由此划分为三种建筑风格特征,本文在第四章将对此阐述。

总体看来,1900年之前的教堂在义和团运动时大部分已经焚毁,现存至今的建筑整体保留比较完好,少数教堂经过几次重新修缮、扩建,难以看出原始模样,有些遗憾。目前,大多存留的教堂建筑是1900年之后修建的。

3.1 1840——1900年的山西天主教堂

在这六十年中,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前二十年属于迅速恢复期,各地教务兴盛,但在此期间出现了很多传教士霸占土地、干涉内政和包庇教民的事件,这样就直接侵犯了人民的和平生活,导致了人们的反抗。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因为民教相争而造成的教案逐渐增多,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更加频繁,民愤很大。

人们对天主教会的猜疑、不满、乃至对抗,必然会影响传教事业,如破坏教堂以及其他教会建筑,等等类似的事情时有发生。即便如此,在此期间,天主传教事业依然发展很快,山西的教堂建筑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3.1.1 1840——1860年天主教堂恢复期

从1840年至1860年的二十年间,西方列强两度向中国发动入侵战争,接踵而至的外患,使中国历经了划时代的巨变。在这急剧动荡的历史时期,传教士们跟随商船和军舰来到中国,从沿海口岸渗入偏僻的内地和遥远的边陲,设立教堂,划分教区,俨然成

为中国社会中的一股特殊势力。天主教的传教士们，径直深入内地，与自雍正以来在禁教政策之下备受压抑的中国信徒们取得联络，恢复了中断已久的信仰上的联系。传教事业在列强的炮火下取得长足的推进和发展。^①

在此期间，山西天主教堂建筑的发展，主要以两种方式获得教会用房，增加教堂建筑，一是清政府赔偿在禁教时期损失的教堂，二是传教士索要被当地人们改作它用的教会建筑。

在 1844 年，中法签订的《黄埔条约》，其中第二十二款规定，法国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国人将法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1846 年，道光发布了上谕，不仅准免查禁天王教，还同意给还天主堂旧址。并发布告示：“天主教既系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已改为庙宇、民居者毋庸查办外，其原旧房屋尚存者，如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②

在这种形式下，重建的教堂和被索回的教堂相继重新成为天主教的财产，如 1860 年（咸丰十年），拨款重修的绛州段家庄天主教堂。另外，交还旧址的如 1861 年（咸丰十一年），法国教士梁多明面见山西巡抚英桂，要求查还绛州的“东雍书院”，该书院清初为教堂（图 3-2），雍正禁教后改为书院，祀奉孔子诸贤。当然，由于地方官绅反对，在年底，总理衙门照会拒绝，但法使哥士耆（Michel Alexandre Kleczkowski）坚决要求归还原址。在 1863 年（同治二年），山西主教派教士张武良终于至绛州接受了东雍书院。^③



图 3-2 原东雍书院的入口大门
顶部竖有表示天主教的十字架
Figure3-2 Entrance of Dongyong Study

3.1.2 1860——1900 年天主教堂扩张期

天主教凭借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传教的权利变为合法，虽然这些条款曾一度使基督

①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第 91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

②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 56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

③ 新绛县志编撰委员会，新绛县志，第 613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年 11 月。

教的传华事业获得了强大的驱动力，然而却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间激起了强烈的民族反感，成为导致波澜迭起的教案的根源之一。从 1860 至 1900 年，西方传教士从沿海的通商口岸深入到内地的穷乡僻壤自由传教，到处建起立有十字架的教堂。不过，“在某一方面，西方人的这种宗教，在 1860 年以后甚至不如以前那样为人们所宽容。因为中国人最怕的就是异端和力量的结合，而在 1860 年以后的时代，基督教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在中国却空前地增大起来。”于是，反教运动，犹如潜动的暗流演化为奔涌的岩浆，喷吐而出，遍布于基督教所能达到的任何地方。^①它在空间上规模大，时间上历时久，程度剧烈。

1860 年以后，天主教在山西的传教士大量占有田产，扩展教会势力，吸收无地农民入教，天主教修会的经费来源逐渐由依靠国外转而直接从中国占有的土地、房产及发放高利贷和经营其他商业活动获取。再加上大量的教案赔款和教徒的奉献，使天主教修会拥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

凭借这些资金，在这段时间里，天主教在山西的教会建筑大量兴建，据资料显示，北境教区的意大利方济各会士艾士杰（Gregorius Grassi）在任副主教与主教期内（1876—1900 年）新建的建筑有：洞儿沟方济各会院、河西圪燎沟大教堂、清源梁泉道教堂、板寺山圣母堂（图 3-3）、阳曲县红沟、河上咀、窑子上教堂、以及其它大小教堂六十余处。此外，还在太原城内创立了正式修道院、修女院、育婴院、学校和大北门外西涧河教士坟地等。^②在这期间的南境教区，仅潞安府（今长治市）地区就建有 20 余座教堂，分布于 14 个县区的村庄。



图 3-3 板寺山教堂
Figure 3-3 Bansishan Church

①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第 174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

②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第四十六卷，第 371 页，中华书局，1997 年。

3.2 1900年分界点——天主教堂的焚毁

1900年,山西的天主教在义和团运动中遭到巨大创伤,教士教徒被杀,主教教堂和附属教会建筑几乎全部被毁灭,还有一些影响较大的教堂也被焚毁,象征天主教的钟楼和十字架被拆掉,祭坛被砸烂,仅有少数建于山内偏远的教堂幸免于难。这是一场教会和教堂建筑的浩劫。

3.2.1 教案的产生

天主教在山西的传播,一方面在客观上起到了一些启蒙的作用,如一部分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传播了一些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沉沦,外国传教士利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逐步把宗教作为侵略和压迫中国人民的工具,致使各类“教案”屡有发生。到十九世纪末,这种民教矛盾已达到极其尖锐的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山西巡抚毓贤十分仇恨洋教,因而借用义和团打击天主教,这就使山西地区的义和团运动骤然兴起,从而导致了庚子教案的产生。

山西地区义和团自1900年6月兴起,7、8月间进入高潮。运动区域大致分为五个地区:以太原府为中心的晋中各县,这是全省义和团活动的中心;以汾阳府的中西部地区;以潞安府为中心的晋东南地区;以平阳府为中心的晋南地区;以大同为中心的晋北地区。在运动中,山西北境教区,被杀主教2人,其它传教士22人,教徒3000余人,毁坏大小教堂近200座,其它建筑物甚多。在山西南境教区,义和团运动激烈的地方应属晋东南地区,被杀教徒1600余人,焚毁各处教堂房屋,教徒逃往他乡,人数顿减。^①

总之,山西义和团运动虽然活动时间不长,但波及范围却十分广泛,自省城太原到各府、州、县,义和团活动于东西南北各地,杀死传教信教者达几千人,教堂损毁破坏达3/4左右,这场运动教会称之为庚子教案。

3.2.2 教案的后果

1901年,清政府与11国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赔款总数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和计9.8亿两。此外,还有地方赔款2000万两,总数超过10亿两,这项赔款史称庚子赔款。其中,山西每年支付116.3万两白银。同年签订了《山西教案合同》

^① 乔志强主编,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第603~604页,山西通史,中华书局,1997年。

地方赔款条例，内容中确定山西付给天主教赔款达 290 万两，另外加上其他教会的赔款以及建学堂筹款总计近 480 万两。^①

如此巨大的赔款，再加上此时的山西发生大灾荒，使得当地人民困苦不堪，山西近代经济从此一蹶不振。而西方教会利用赔款，一方面大量新建教堂以及附属建筑，另一方面以赈济灾民的形式，大量拉拢人们入教，兼并土地，使教会成为有些地区最大的势力。

3.3 1900——1949 年的山西天主教堂

在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中国的社会是复杂而动荡不安的，内忧外患，连年战争，天灾人祸，人们生活困苦不堪，天主教在此背景之下，以赈济的形式吸收教徒，在农村乡镇中迅速发展起来。

与此同时，中国新的时代背景已经形成，西方先进文化涌入，觉醒的中国人渴求变革，中国天主教会为适应中国潮流，自身内部出现本土化趋势。教堂建筑的风格、式样、建造方式都不同程度的发生了变化。

3.3.1 1900——1920 年天主教堂膨胀期

1900 至 1920 年的二十年，教会史上将此称为“黄金时代”，因为在华各教会的传教事业的推进之迅速，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教会虽然经历了庚子事变的严重挫折，但传教运动进入了一个充满机会的新时期。一方面，在条约制度的保护下，传教士们一如既往地沿海通商口岸深入中国内地传播教义，设立据点，划分教区。另一方面，教会外部的社会环境则发生了迥异于 19 世纪的变化：其一，庚子事变以后，教会鉴于事变惨痛的教训，对自身的行径做出了一些反省和检讨，对传教士和教会在政治上的活动，做出了限制。因此，20 世纪以后各地



图 3-4 建于 1905 年的太原主教座堂
Figure 3-4 Taiyuan Cathedral Built in 1905

因诉讼引起的民教冲突相对减少，教会的社会形象有所改变。其二，1912 年中华民国成

^① 刘泽民等主编，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史（近代卷卷六），277-287 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

立以后，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从法理上肯定了公民信教的自由。这是中国国家与宗教关系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无疑对促进传教事业有积极的作用。^①

1900年以后，天主教教会的传教工作虽然也有长足的发展，但其重点主要在农村，一个家族或整村地争取教徒，它虽然也设有一些初等学校，但主要是让教徒的子女入学。当时在华的天主教会，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增加教会信徒的人数，扩展教会的规模，增加他们的信仰。与此同时，基督新教的传教士们则更多地将工作重点放在使整个中国社会基督教化，而不是仅仅转变个人的信仰。因此，新教传教士主要的精力和财力投向了教育、医疗和卫生事业。相比之下，天主教对急速变动的社会潮流没有做出回应，缺少社会事业的投入。

这二十年，山西天主教会以城镇为中心向四周农村辐射发展，出现了全村信教的现象。到1925年，教徒人数从1900年的一万多人增至四万人，教务兴盛。山西的教会建筑蓬勃发展，利用庚子赔款，不仅新建教堂，还有修道院、学校、医院、孤儿院、养老院等。资料显示，从1902年到1910年，山西北境教区主教凤朝瑞在职期间，兴建了太原主教座堂（图3-4）、总堂神父大楼（图3-5）、修女院大楼、若瑟医院、修道院和大小教堂67座。^②从1900到1920年，南境教区主教翟守仁建设大小教堂300余座，仅潞安地区就新建教堂57座。^③



图 3-5 总堂神父大楼内院
Figure3-5 Yard of Father's Building

3.3.2 1920—1949年天主教堂变动期

这段时间正是中国社会急剧动荡不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的时期，而中国的教会也随之逐渐成长。这期间出现了相关天主教的运动，一个是1922年至1927年，社会上爆发的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它缘起于知识界和政界，使用了在新文化运动中从西方传来的思想作为批判基督教的理论武器，非教会人士与教会人士在笔战中针锋相对，各抒己见。另一个是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运动。“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二十世

①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第35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②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第四十六卷，第370页，中华书局，1997年。

③ 马良等，天主教长治教区简史（内部资料），第26页，教友生活编辑部，1997年12月。

纪二十年代以后中国天主教会内出现的本土化趋势。当时中国天主教会内部的本土化运动的出现，与同一时期基督教新教的本色运动一样，都是强调摆脱帝国主义对教会的影响。在二十世纪初，先由部分中国天主教会人士和西方传教士从基层推动此运动，然后罗马教廷在经过对信仰和传教方式的反省之后，大力推行中国天主教会的本土化的运动。^①

天主教历来是反改革的守旧宗教，虽然在此时提出了本土化运动的口号，但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就像中世纪的教会极力维持神化的宗教性质，但最终不得不吸纳世俗化的风情。顺应时代的步伐，才能被时代中的人们所接受。当时，本土化的主要手段是主教由中国人担任。南北境后来分出的汾阳、洪洞教区的主教均是山西人。

本土化的运动真正影响到山西教堂建筑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如南境教区的洪洞庄园村修道院的天主堂、黄崖天主堂（图 3-6）等，已经出现带有中式特色和西式风格结合的建筑形式，但不久即爆发了战争。在战争期间，教会建筑几乎停滞，尤其是对抗日军的堂区，教堂被焚毁，神父被杀或逃离，如襄垣赵家岭天主堂毁于战火，洪洞主教成玉堂惨死狱中。^②不过，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破坏的教区很快复原。

整体看来，天主教在这段期间虽然停止了建造活动，但教务发展一直持续，有的地区，基本未受到损失，如德籍教士管辖的朔州教区、意籍教士管辖的太原教区等。

应该提及的一点就是，山西天主教不断的收敛财富，积累的资产达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资料显示，在抗战结束时，太原教区就经济实力而言，位居全国各教区第二，仅次于北京教区，拥有银元 260 万，在武汉有 13 栋楼房，在天津有 28 栋楼房，在太原有 30 多处出租房产和土地 3000 余亩。每年房租、银行利息收入即达 21 万元。^③有如此强大的财力支持，使山西天主教的实力名列前茅。



图 3-6 黄崖天主堂
Figure 3-6 Huangya Church

①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第 483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

② 马良等，天主教长治教区简史（内部资料），第 92，122 页，教友生活编辑部，1997 年 12 月。

③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第四十六卷，第 420 页，中华书局，1997 年。

3.4 小结

近代山西天主教堂建筑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它们随着社会环境、宗教环境、人们的思想等方面的变化而产生变化。

从社会环境来说，随着西方势力在中国的不断扩张，天主教也不断扩大其传教范围，教士所到之处便传播教义，设立教堂。在山西，由于当地政府惧怕外国势力，不插手教会事务，所以，教徒、教堂数量增加很快。虽然，1900年天主教遭到重创，但在此之后，当地政府为讨好传教士而大开方便之门，传教事业达到高峰，天主教堂遍地开花。

从宗教环境来说，近代初期时，原先的佛教、道教等信徒数量还较多，但从清末民初以来，破除迷信之说兴起，出现了到处“毁坏佛像，占据寺院庵观驱逐僧道女尼”的现象。很多地方都发生了毁庙反神风潮，大量寺庙道观非毁即为新式学堂所占。^①佛教、道教以及伊斯兰教在整体上处于衰落之中；与此相对的，受到西方国家保护的天主、基督教会发展势头却颇为强劲。这在客观上也给山西天主教堂建筑的发展带来有利条件。

从人们的思想来说，百年的近代历史，中国处于被侵略和压迫的地位，“上邦之国”的优越感逐渐消失殆尽。在近代初期，人们还不能接受西方宗教文化，但到了1900年之后，西方技术和物质的优越，使人们开始向往并且愿意了解这些外来的事物，人们思想的这种转变为教堂建筑的发展带来了活力，如山西有的教堂由国人设计，他们大多接受过西方文化的教育，地方传统和西方文化相结合，从而创造了中国式的教堂建筑。

由此可总结出近代山西天主教堂建筑的整体概况：以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为划分点，可分为两大阶段。

教堂发展的初期阶段（1840—1900），包括教堂的恢复期和扩张期。从1840—1860年，是天主教堂的恢复期。在之前的禁教期间，天主教堂有的被挪作它用，改为读书学堂、庙宇、民房等用途；有的被拆毁，材料改建其他房屋。天主教弛禁之后，教会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一方面利用向清政府索要赔偿重建教堂，一方面收回被改为它用的教会建筑，另外，一些地方使用当地教徒的宅院作为教堂。教会建筑逐渐恢复，重新发挥它的功能。从1860—1900年，是天主教堂的扩张期。随着天主教的势力不断增加，在神父的主持下，开始深入各处建造教堂，教堂汲取了西方教堂建筑的宗教理念，并尽可能兼顾当地的风俗习惯。

教堂发展的成熟阶段（1900—1949），包括教堂的膨胀期和变动期。从1900—

① 乔润令，山西民俗与山西人，中国城市出版社，1995。

1920年,是天主教堂的膨胀期。庚子赔款后的几年里,山西各地重建和新建了大量教堂,以中世纪时的欧洲教堂建筑类型为蓝本,出现了一批带有哥特式、罗马风、巴洛克式的混合风格的教堂式样。这二十年是教会史上的黄金时代,也是教堂建筑的黄金时代。从1920—1949年,是天主教堂的变动期。全国天主教本土化运动的推动下,山西地区出现了中国式的教堂,把天主教堂传统型制与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结合,虽然还没有形成鲜明的风格,成熟的手法,但确是一种新的建筑形式的尝试和探索。

总体来看,在1900年之前的教堂建筑,尽管借鉴了西方的建筑造型,但教会希望通过尊重中国人的习惯,从而得到中国人的认可,所以采取了大量中式建造手段,如教堂朝向多为坐北朝南,教堂主体多是传统民宅式样,有的教堂立面还借用了牌楼的建造手法等等,这些都迎合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而1900年庚子赔款之后,教会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大量建造教堂,另一方面其建筑不再顾及中国人的习惯,而完全按照西方宗教的仪式和特点建造了。由此看来,山西的教堂建筑,从其形式的发展与演变上可以看到西方传教士在异域他乡传播教义所持的心态,以及对华的态度。传教本身应该是带着博爱、众生平等的态度,而不应是征服者的面貌,近代天主教传播的时期,人们以卑微的地位应对骄傲的传教者,产生了不平等的教会发展,也促使教堂建筑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形式。

第四章 山西南境教区近代天主教堂建筑实例剖析

山西南境教区成立之前,在此范围内已经有部分教堂建筑分布并保留下来,但数量稀少,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山西南境教区的教堂建筑大多是 1900 年以后兴建的。在受到义和团运动影响之后,新建的教堂超过了原有的总数,20 世纪二三十年达到顶盛,但随后十几年的战争期间,教堂建筑遭受了枪炮洗礼,尤其是潞安教区天主教,部分教堂建筑破坏严重,如赵家岭圣母堂被焚毁、沁水天主堂被破坏等等。^①解放后,在文革期间,大多教堂的钟塔拆除,所记载的文字座碑捣毁。存留至今的教堂大多被修复过,新建了钟塔,装修了建筑内部,外部也重新粉刷,值得庆幸是,鉴于教堂的神圣地位,修复后的教堂大多保留了原貌,为近代教堂建筑的研究提供宝贵的依据。

笔者认为山西天主教堂建筑可分成三种不同形式,即以中国传统形式为基础的近代早期教堂形式,处于教堂发展初期阶段中的前二十年左右;以西方教堂形式为基础的近代中期教堂形式,活跃于 1900 年前后二三十年;中西混合形式的近代后期教堂形式,处于教堂发展成熟阶段的后二三十年。

4.1 近代早期的教堂形式——以中国传统形式为基础

天主教进入山西并被人们接受,不仅要施以恩惠,传播教义,还要融入当地的民俗风情。在建筑上,早期的山西天主教堂是以传统的地方建筑为基础而建造的,主要是当地的人们自愿而建,建筑受到传教士的影响较少。但早期建筑实例留存很少,只能从个别教堂的残留部分大致分析它的样式。

实例与分析

长治市高家庄村天主堂

高家庄村天主堂位于长治郊区。高家庄是天主教村,教徒人数占全村人口总数的 96%以上,迄今约有 260 年的历史。

若瑟堂始建于 1859 年,名为若瑟堂,据当地老人言,是当地教徒献地、献物、出钱出力,建起六开间的教堂一座,随后又在教堂东侧建了北房 10 间,南房 8 间。这是

^① 马良等,天主教长治教区简史(内部资料),第 132 页,教友生活编辑部,1997 年 12 月

最初的教堂。在 1879 年重建若瑟堂，教堂坐北向南，南北长 31m，东西 14m，建筑面积 434 m²。在 1902 年，由当地人鹿兴荣等在教堂侧边添盖了两个祭所，在堂东侧增建了东房 5 间，耳房 5 间，分成前后两个院。1931 年，在荷兰籍方济各会会长方以义神父的主持下，在高家庄办修道院，于 1935 年在若瑟堂附近建成两排楼房共 30 间。在解放前，共建有除教堂外的神父院 45 间，修道院 88 间，养老院 19 间，这其中楼房 41 间，总占地面积 29000 m² 有余，建筑面积 9000 m² 左右。^①

建筑平面为拉丁十字，但形制不很规矩，十字的短边上下错开，不在对称位置，后部中央是圣坛，其上部空间高于中厅。从教堂的侧面和后部（图 4-1）可以看到：墙体采用清水砖墙，并饰以折线和十字装饰纹，窗户为半圆拱形，屋顶为两坡顶，教堂的后部因高度不同，分上下两层。屋顶的檐口截面呈波浪形向前突出。从目前若瑟堂的现状来看，教堂立面（图 4-2）已经重新修建，无从考证是否为当初的形式。水平展开的立面装饰线和巴洛克式的弧形曲线缓解了向上的动势，整个教堂具有意大利的哥特风格。面砖贴面的立面形式，使这一教堂具有说不清的新旧重叠的特点。

教堂除正立面外，其它部分大体是以中国传统形式而建造的，就连窗洞上的过梁的做法都与窑洞的做法一致。平面所表现的十字有些牵强。可见，早期的教堂建筑还不能完全表达天主教的教义，而更多的是符合当地人的习惯。



图 4-1 教堂后部
The Back of Church



图 4-2 教堂立面
Figure4-2The Facade of Church

^① 马良等，天主教长治教区简史（内部资料），第 50、71 页，教友生活编辑部，1997 年 12 月。

4.2 近代中期的教堂形式——以西方教堂形式为基础

在山西近代教堂建筑中，建于 1900 年前后二三十年的教堂大多是仿照西方教堂的式样修建的，但为了平衡与当地民俗民风格格不入的样式，添加了一些中式元素。南境教区的教堂大多模仿哥特式建筑风格，也许是这种风格更能体现天主教的宗教理念和宗教教义，高耸的钟塔则似乎展示着西方的强大。

4.2.1 重点剖析

潞城县南天贡村无原罪圣母堂

南天贡村无原罪圣母堂建于 1906 年，于 1908 年竣工，历时三年，耗资四万两白银，由时任荷兰籍柯岚霭神父主持修建。整个堂院面积 49000 m²，建筑面积 3462.15 m²。教堂坐北向南，教堂面积 810 m²，钟楼高三十余米，是华北名堂之一。在 1987 年，当地教徒对教堂进行全面大修，修复被毁的钟楼，到 1990 年完工，堂内外基本恢复旧观。^①

• 内部形式

教堂平面（图 4-3）为拉丁十字式，内部以祭台为主，设在后部中央的最显赫处，此为教堂的圣坛之处，呈半圆形空间，顶部以半穹顶覆盖，在圣坛两边各相邻一个小礼拜室。建筑主入口两侧为圆形的塔楼，顺着木制的旋转楼梯可以上到顶楼。教堂内部有 16 根圆形石柱排列两侧，把大厅分为三部分，中厅和两个侧廊。中厅高约 20m，比两边侧廊顶高近 1/3 倍，高出的外墙部分分开出圆形窗户，侧廊外墙上设有两排拱型窗户，它们的作用除了美观和使殿内有足够的采光之外，还有两个功能，一是吸尘，另一功能是吸声。

室内石柱的柱头形状似正立的碗形，外部刻有浅图案，柱身被包裹成各种颜色和纹理，使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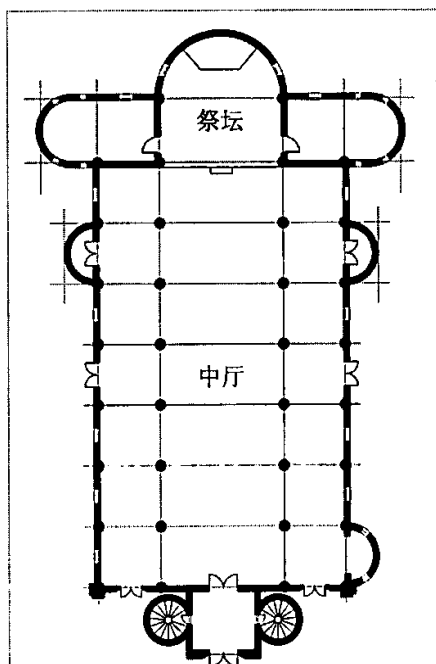


图 4-3 教堂平面

Figure 4-3 The Flat of Church

^① 马良等，天主教长治教区简史（内部资料），第 51 页，教友生活编辑部，1997 年 12 月。

壮的柱头与柱础隐设在华丽的色彩下。内部装饰主要以壁画、线脚、几何图案为主，如柱与柱的上部墙身上的各种宗教故事的绘画，侧廊顶部的线条图案等等，汇聚成一个斑斓的空间。教堂顶部采用十字拱的结构，拱与拱的交汇点有倒立的尖塔，起装饰作用。

(图 5-12)

• 立面外观

教堂建筑的主立面(图 4-4)很丰富，窄小细长的长方形半圆拱形条窗是主要元素之一，条窗两侧有修长的壁柱，柱头图案复杂，相对于柱身很大，比例不协调。入口的门洞在两侧逐层深入壁柱下显露出来，颇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味。中央部分为三个钟楼，合成一组，两边的小塔簇拥着正中的葱头状的主塔，再加上次入口上的几个小葱头塔，形成热热闹闹的升腾之势。建筑的其他立面与主立面紧紧呼应，表现出相同的元素。

整个教堂建造讲究，做工精细，主体结构是为罗马风式，但正立面带有折衷主义的拜占庭建筑风格。教堂四周的附属建筑也掺入了相似的元素与风格，衬托了主题。



图 4-4 教堂立面

Figure 4-4 The Facade of Church

4.2.2 其它实例分析

4.2.2.1 长治市马厂村天主堂

马厂村天主堂位于长治郊区，是原潞安教区和现长治教区主教府座堂。始建于 1873 年，至 1879 年竣工，名为耶稣圣心堂，由当地教徒自捐资金，时任座堂神父为荷兰籍的法有德。随后又建主教府、修道院、修女院、学校等，总建筑面积 3208 m²，占地面积 14790 m²。^①

教堂坐东向西，主体大厅采用了西方传统的拉丁十字平面，六间进深。内部以祭台为主，设在后部中央的最显赫处，祭台为半圆形。教堂有钟楼一座，位于拉丁十字的短边的北部。钟楼(图 4-5)的造型极为突出，顶部是半圆形穹顶，支撑它的柱与柱之间

^① 马良等，天主教长治教区简史(内部资料)，第 67 页，教友生活编辑部，1997 年 12 月。

开有半圆拱洞，西角装饰有浅绿色宝瓶形。



图 4-5 教堂钟楼

Figure4-5The Belfry of Church



图 4-6 教堂立面

Figure4-6The Facade of Church

耶稣圣心堂的立面（图 4-6）呈现意大利的巴洛克风格，由横向的两部分构成，上层为中央大厅的上部空间，立面中心为一个拱形龕，内有耶稣圣像一尊，两边各有双柱壁饰；下层为三个入口，中间主入口为半圆形拱门，两侧有门联一副，“无始无终先作行声真主宰，宣仁宣义进昭拯济大权衡”，两侧次入口门上饰有三角形装饰，门上分别有两副楹联，北侧为“崇真原”，南侧为“阐至道”，三个大门之间均有双柱装饰。柱子型制简洁、古朴。

教堂外部窗户为半圆拱形窗和圆形窗，窗棂装饰有中式风格。教堂钟楼极具艺术特点，顶部为半圆形拱券，装饰颜色高雅。

4.2.2.2 潞城县羌城村天主堂

羌城村天主堂始建于 1883 年，名为安多尼堂，东西朝向，教堂建筑面积 380 m²，后来由意大利籍富格辣副主教在教堂西侧建修道院一所，共建配房 104 间，占地面积 9900 m²，建筑面积 1976 m²。1900 年，义和团运动，羌城教堂被烧毁。此后，于 1902 年修复。1904 年在原小修院创办安多尼学校。1930



图 4-7 羌城天主堂

Figure4-7Qiangcheng Church

年又成立了明星女校。目前，教堂由当地小学占用。^①

安多尼堂的外立面（图 4-7）构成垂直的三段式，三部分极为相似，半圆形拱门，上部有三角形装饰，与拱门相距较远，顶部为几层叠起的台子，像古时的塔基。正中的主入口，大门上承一个圆形窗洞，大门两侧有双柱装饰，柱式简单，顶部三角形也开有一个圆窗洞，并有窗花装饰，两侧墙面上有方形中式雕刻图案，顶部的屋檐做成曲线造型，带有巴洛可的味道。正中部分对比两侧，从高度、装饰、造型上的处理强调了中央部分。整个建筑简洁大方，严肃的对称构图又不乏活泼的趣味。

从目前看来，虽然教堂受到部分破坏，墙体被粉刷成黄白两色，两个次入口被堵住，屋顶因未加管理已经杂草丛生，但是它的造型特点在周围建筑中显得鲜明而突出。

4.2.2.3 洪洞县区亭镇韩罗堰圣母堂

韩罗堰圣母堂始建于 1894 年，由荷兰籍传教士范神父主持建造，是洪洞县最早的一座圣堂，能容纳 400 余人。另外，还建有其它房间 35 间，砖窑 3 孔，共占地 1200 m²。^②

教堂坐东向西，型制为巴西利卡式的长方形。正立面（图 4-8）带有巴洛克风格，最典型的处理手段是，入口两侧使用双壁柱，教堂中厅外墙与侧廊外墙之间用反曲的涡卷作为过渡。而居中的圆形华丽玫瑰窗，成为整个构图的中心点。钟楼位于中央顶端，它的三面有镂空的砖制围栏，图案是圆圈和十字的重复。经过恰当的比例处理和装饰带的联接，建筑显得端庄、生动。整个立面构图严谨，变化丰富而不失整体感，巴洛克式的涡卷和双柱、哥特式的玫瑰窗加上中式建筑的窗洞、窗台构造和钟楼围栏装饰，组成中国近代建筑特有的各种风格混杂的建造造型。



图 4-8 韩罗堰圣母堂
Figure 4-8 Hanluoyan Church

① 马良等，天主教长治教区简史（内部资料），第 107-108 页，教友生活编辑部，1997 年 12 月。

②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第四十六卷，第 409 页，中华书局，1997 年。

4.2.2.4 长治市黄碾镇圣家堂

黄碾镇圣家堂坐落在长治市黄北村最高处，始建于 1902 年，坐东向西，建筑面积 285 m²，钟楼高 38m。随后，另建有神父住房 5 间，占地面积 3500 m²。1989 年重建了钟楼，装修了室内。^①

教堂平面为长方形，六间进深，后部两侧有忏悔室两间。门洞和窗洞都由双层类哥特式的尖券装饰，造型相似。正立面（图 4-9）由竖向的三部分构成，中央的入口的两层尖券之间开有窗洞，窗棱成花瓣式样，最外层尖券上有“全能主”的刻字。钟楼在入口上部中央位置，已不是原貌，但钟楼基底，即入口上部开有五个狭长的拱券。正面中央与两侧因为有高差，两者之间以三角形山墙连接。窗门之间均有壁柱作装饰，柱式简单。屋顶为两坡顶，传统的中式做法。简化的尖顶、尖券和透视门，高高举起的钟楼，夸张的檐口装饰带，具有浪漫主义哥特复兴的风格。



图 4-9 黄碾天主堂
Figure4-9Huangnian Church



图 4-10 南杜壁天主堂
Figure4-10Nandubi Church

4.2.2.5 霍县南杜壁村天主堂

在 1900 年后，由荷兰籍传教士柯神父主持，利用庚子赔款，在霍县南杜壁村兴建天主堂一座，名为保禄堂，占地 1400 m²，另外还附设学校、育婴堂。总共平房 43 间，砖窑 37 孔，地窑 1 孔，保存基本完好。南杜壁天主堂因其华丽壮观，在洪洞教区各教

① 马良等，天主教长治教区简史（内部资料），第 80 页，教友生活编辑部，1997 年 12 月。

堂中首屈一指。^①

教堂的西立面(图4-10)是仿哥特式的,门窗使用尖券,屋顶上一簇簇起起落落向上的小尖塔,还有向上直冲的钟楼,展示出强有力的升腾之势,强调了教徒们对天国的向往。建筑坐东朝西,西立面宽度14米,通宽约21m,长约34m。教堂采用拉丁十字形制,十字的短边是两个高耸的钟楼,后部半圆形的圣坛连接对外的门斗,这扇门通向一道向上的斜坡,直达后院的平房,那是神父的住所,这种高差起落的布局方式,是很独特的设计。圣坛顶部的屋顶做得极其考究,真正显示了中式屋顶的华美。

教堂的窗户采用了组合式:细长的联排尖券形,上承一个圆窗洞,窗棱刻画细腻。立面的墙身、柱身均饰有雕刻花纹和图案。整个建筑处处呼应,十多个跳跃的尖塔营造出热闹的气氛。

4.2.2.6 洪洞县马牧天主堂

马牧天主堂始建于1904年,名为耶稣圣心堂,东西朝向,1995年修复钟楼,2002年翻新教堂。另外,其它房37间,砖窑11孔,整个堂院占地面积14000m²。^②



图4-11 马牧天主堂
Figure4-11Mamu church

教堂采用矩形平面,宽约17m,长约25.6m,七开间,中厅高于侧廊,圣坛是类半圆的多边形,以穹顶覆盖,其两侧各有一个小礼拜室。顶部使用十字拱结构,支撑的柱子粗壮而敦厚,柱式简洁而大方。建筑主立面(图4-11)的构图为,一对塔夹着中厅的山墙,垂直地分为三部分,是典型的哥特式划分,但细部过于简单,圆形券洞的运用使建筑显得不够轻灵。后部矩形部分的造型具有罗马风时期的风格,粗重,厚实,竟与山西地方建筑的淳朴有所和谐。从斑驳的墙面、修补过的砖体能够看出,它曾经历了战火的洗礼,以至与鲜亮的新琉璃屋顶形成难以言表的对比。

①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第四十六卷,第409页,中华书局,1997年。

② 教堂石碑介绍。

4.3 近代后期的教堂形式——中西结合的本土化形式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天主教推行教会本土化的运动，教堂的样式提倡采用中国建筑形式，天主教驻中国总代表刚恒毅（Costantini）主教认为：“既不要完全中国式的建筑也不要西方式的建筑。”在这种背景下，天主教堂的式样出现了探索性的变化。教士格里森（Gresnigt）认为“所有的建筑形式都存在着互相适应的问题，但决不能提倡机械模仿现有的中国寺庙和塔的形式，采用中国建筑形式的目的，是想用这种与众不同的建筑形式来反映真正的中国精神，充分表现中国的美学观念。”^①在山西，天主教堂建筑有的由中国教徒自己设计，一般都受过像北京辅仁大学等教会学府的培养。这些教堂并不是简单的在西方形式上加加减减、局部添以中国建筑元素，而是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与西方教堂的有机组合，是以宗教要求为基础进行设计创造，它是天主教在山西传播的特殊产物。

4.3.1 重点剖析

新绛天主堂

新绛县天主教大教堂位于县城的西北高地，北街顶端的高崖上，是全国四大哥特式教堂建筑之一。1937年由原绛州教区荷兰籍传教士孔昭明主教奠基兴建。据传孔昭明的母亲为纪念其子荣任主教，独资赞助黄金 45 kg，于 1943 年落成启用。新绛县城内教堂系主教座堂，名为安道，占地大约 33000 m²，可容纳教徒千余人。据说教堂为北京辅仁大学教授设计，施工以及雕刻绘画皆出自晋东南的工匠。教堂共有房屋 194 间，设修道院、修女院、学校、医院、养老院、孤儿院，另外还建有客厅、寓所、小花园等附加设施。教堂坐北向南，南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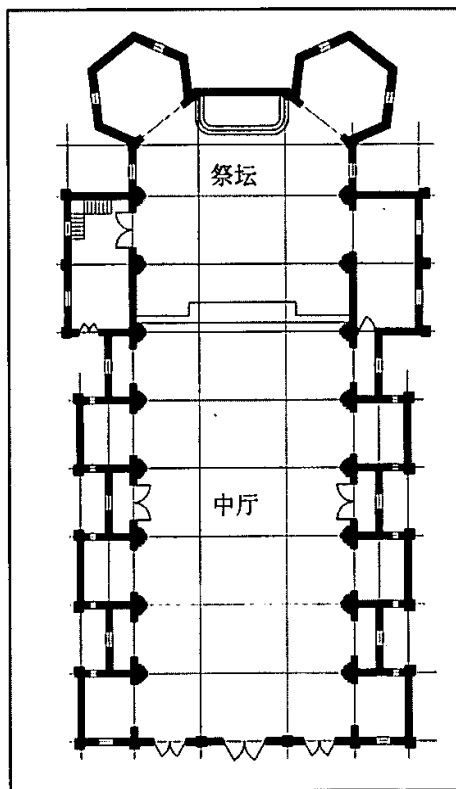


图 4-12 教堂平面
Figure4-12The Flat of Church

① 格里森，董黎译，中国的建筑艺术，华中建筑，1997，04 期，第 127 页。

长 52m, 东西宽 28m, 建筑面积约 600 m²。①

• 平面形式

从教堂的平面(图 4-12)来看是拉丁十字形, 但不典型, 在祭坛的后部两侧各突出一个六边形礼拜室, 左右各有两开间的小室, 一个是小型祈祷室, 另一个是二层空间。主体两侧的柱与柱之间都有一个突出的部分, 一大一小对应成一高一矮的空间, 彼此间隔排列。入口两边是钟楼。



图 4-13 教堂内部

Figure4-13 Interior of Church

建筑内部无立柱支撑, 代之以高 22m、跨度 25m^②的九道巨型拱券, 使内部(图 4-13)

空阔高大, 全部砖木材料, 在当时, 工艺是较新颖的。支撑拱券的柱子是五束合为一体的束柱。内部装饰简单, 只在祭坛上部的穹顶绘有画面。

• 立面外观

安道教堂的正面(图 4-14)以哥特式风格来表现, 一对塔夹着中厅的山墙, 垂直地



图 4-14 安道教堂

Figure4-14 Andao Church

分为三部分。构图元素中浮雕式的半圆形券使用较频繁, 双排的拱券和多排连续券是它的一大特点。两侧钟楼高约 43m, 顶端是后建的, 形式与其他的部分不相称。细部装饰精致, 装饰花纹以花草、叶形、波浪纹为主。入口大门上部的三角尖顶装饰有向上的动感很强的花叶纹, 而中厅山墙的檐口处有中式的云形纹, 相互映衬。

后部主体屋顶为仿中国古建, 筒子瓦、虎头窗、厦坡, 屋脊高达 27 米。^③檐口的线脚截面小、凹凸大, 显得厚重、敦实。侧面突出空间的三角屋顶, 层层深入的线框, 又带有罗马式的韵味。支撑墙体的扶壁从上到下依次加粗, 成为三段。

① 教堂内部资料。
② 教堂内部资料。
③ 教堂内部资料。

六变形礼拜室的屋顶做成攒尖形式。

教堂建在城内的高地上，可以俯瞰村庄，这种姿态把人与神的界线明朗化。从教堂正面大门进入，需要上几十个台阶才能到达它前面的空地。比较有趣的是，建筑入口两侧各有一个绵羊石墩，一来从宗教上寓意教徒是上帝的羔羊，二来从艺术上表现当地建筑的特色。

新绛天主堂是山西教堂建筑中最大的中西合璧的建筑之一，在东亚以及东南亚一带颇具盛名。

4.3.2 其它实例分析

4.3.2.1 洪洞县庄园村天主堂

洪洞县庄园村的路德圣母堂（图 4-15）建于 1916 年，由荷兰籍神甫法春荣督建，教堂占地 100 m² 多，可容纳 300 余人。^①当时虽是洪洞教区主教府所在地，但整体教堂规模小。东西向的矩形平面，钟楼位于主体的后部中央。这一简朴的圣母堂，造型简洁，主体突出，中西方的装饰细部在整体风格中获得统一，使这座建筑显得亲切，精巧。

在庄园村的另一个天主堂是小修道院内的天主堂。在 1933 年，由中国神父李栋材督工兴建，1935 年竣工。整个修院占地约 20000 m²，总建筑面积 2147 m²。^②此时教堂式样的最大变化就是完全把人字形屋顶显露在主立面上，愈加完整的突出了屋顶重要性，应该说，这是中西结合的中国式教堂。但因保护不力，小教堂已经被拆，只剩下一张旧照片（图 4-16）存留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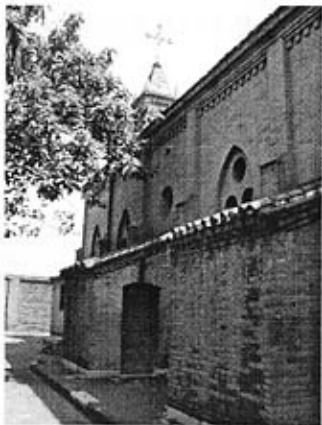


图 4-15 露德
圣母堂
Figure4-15
Lude Church



图 4-16 修道院天主堂照片
Figure4-16 Monastery Picture

①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第四十六卷，第 405 页，中华书局，1997 年

② 同上，第 399 页。

4.3.2.2 新绛坡里村圣母堂

新绛张庄坡亦称坡里，又称凤凰岭，清咸丰年间因遭灾难逃到此地的4户人家中，有马、秦两户信教。1884年（光绪十年）外国教士征得马家同意，将其窑洞改作宗教活动场所。1921年荷兰籍神甫法春荣建圣母堂1座，长17m，宽7m，能容400名教徒，另有其它房间11间，并设小学1所。1964年教堂关闭。1981年，教徒自筹资金，对旧堂翻修扩建，面积达270m²。^①

教堂位于山坡之上，从那里可以俯瞰整个村庄。建筑规模较小，平面为长方形，五开间，东西朝向，主立面（图4-17）位于矩形的长边，中央为突出的入口，上部是钟楼。尖券门洞，尖券联窗，两坡顶，檐部各有一个小塔。教堂最大的特点就是把主入口设在了长边，建筑表现出横向的伸展，而中部的钟楼竖向生长，构成十字的立面效果。虽然违反了教会规定的形制，但并不缺少宗教意味。



图 4-17 坡里圣母堂
Figure 4-17 Poli Church

4.4 小结

山西近代教堂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建筑风格演变出三种不同形式，但无论是早期的以中国传统形式为基础教堂建筑，还是中期的以西方教堂形式为基础教堂建筑，以及后来中西结合的以本土化为主的形式，贯穿始终的总体特征就是不同程度上的中西交融、合璧合成。

早期的天主教，一般使用当地教徒捐献的房屋作为活动场所，随后在此基础上，建造教堂，施工者与资金来源大多为当地教徒。教堂形式、建造技术、内部装饰等遵循当地传统式样，适当结合天主教义，使用矩形或十字形的平面，表现出天主教的空间型制与当地传统造型相结合的结果。应当提及的一点是，为了突出中央祭坛的空间高度，此处的屋顶高出其它部分，呈现出类似重檐的特殊效果，中西方建筑观念在此统一起来，这也是中西交融的一种形式。

^①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第四十六卷，第385页，中华书局，1997年。建造时间一说是1936年，见新绛县志，第614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

以西方教堂形式为基础的教堂建筑，是山西南境教区采用最多的一种形式。传教士照搬或模仿哥特、罗马风、巴洛克的教堂模式，受当时西方折衷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些教堂多以风格混杂的形式出现，多数教堂以西洋式构图及造型为主，加上中国传统建筑的局部构件或细部处理，体现出以西式风格为主，中式为辅的中西交融。

中西结合的以本土化为主的形式的出现，是教堂建筑随时代发展的一个结果，天主教本土化运动成为助推力。这也是教会在物质形态上更接近居民，最终在心理上征服居民的一种策略。南境教区的本土化教堂中，如洪洞庄园村小修道院内的天主堂、黄崖天主堂较多的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风格，窗洞使用当地民居常见的做法，是典型的中国式教堂，体现了西方宗教教义和建筑风格中式化的中西交融。

上述三种不同程度的中西交融的教堂风格的出现，归根结底是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在彼长此削的过程中，在建筑上的表现。

山西的教堂建筑，基本源于外国传教士的设计与督造。山西南境教区的近代天主教堂大多是由荷兰籍传教士设计、监工修建，建造者是当地的手工工匠。所以这些南境教区的教堂之间都有相似的元素，如双排的圆拱或尖拱门窗和浮雕、连续券等；相似的空间，如位于主体教堂两侧的低矮的斜顶覆盖的突出忏悔室。这些相似相通的设计成为山西南境教区的一个基本特征。

第五章 山西近代天主教堂建筑与西方传统建筑的特征比较

西方的天主教堂在初期继承了古罗马晚期基督教教堂的形制，从修道院教堂的建造开始，随后教堂逐渐发展成为中世纪城市中最重要、最壮观的纪念性建筑物。此后教堂建筑在风格样式、技术水平等方面不断发生着变化。山西近代教堂就是参照西方的教堂设计建造的。本章通过对比两者之间的特征，从而理清山西近代天主教堂建筑的基本特征。

5.1 建筑风格的比较

5.1.1 传入山西的西方传统天主教堂风格

(1) 罗马风式教堂建筑 (Romanesque Architecture) 罗马风式教堂 (图 5-1-1) 主要由僧侣工匠建造。这种教堂带有浓重的宗教气氛，沉重的墙、墩子和拱顶，狭长而高大的中厅和侧廊，深而远的祭坛，压抑的尺度，引起人的忧郁和自省的情绪。^①



图 5-1-1 罗马风式教堂建筑
Figure 5-1-1 Romanesque
Architecture



图 5-1-2 哥特式教堂建筑
Figure 5-1-2 Gothic Architecture

(2) 哥特式教堂建筑 (Gothic Architecture) 哥特式教堂建筑 (图 5-1-2) 是在中世纪的西欧建筑的一个高峰。哥特式建筑的总体风格特点是：空灵、纤瘦、高耸、尖峭。它们直接反映了中世

纪新的结构技术和浓厚的宗教意识。

(3) 巴洛克式教堂建筑 (Baroque Architecture) 罗马的一批天主教堂是巴洛克风格的代表性建筑物。这些教堂形式新奇怪异，力求突破既有的规则，强调动态和不安，追

^① 陈志华，外国建筑史（19 世纪末叶以前）（第二版），第 93 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 年 6 月。

求个性，极力使观者惊讶。^①早期的罗马耶稣会教堂作为蓝本模式广泛推广。

这三种欧洲古典教堂风格都不同程度地引入山西天主教堂建筑。此外，早期的古罗马遗风和基督教精神结合的巴西利卡型制，也用于规模较小的教堂建筑中。

5.1.2 山西近代天主教堂建筑的风格

对于山西的近代教堂建筑，要把它们归为某一类型的建筑风格是不太合理和准确的，因为所有的教堂并没有中规中矩的按照一种建筑风格来做，一般是以某种风格为主，掺杂了其它风格元素，并呈现出中西风格的交融。

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从当时欧洲的建筑背景来看，18~19世纪，西方建筑正经历着一场大的变革，是基督教艺术彻底衰亡的时代，在教堂建筑上流行无规范的复古样式，教堂建筑已呈多元发展之势。19世纪多有“古典式”、“新哥特式”、“新罗马式”、“新文艺复兴式”、和“新巴洛克式”艺术风格的教堂问世，其它世俗化建筑风格也影响到教堂的设计和建造，传入山西的建筑风格自然会受到影响；第二从主持设计者来看，建筑式样是由传教士凭记忆或随身带来不完善的教堂图纸而模仿建造的，他们不是真正的建筑师，多种建筑风格难免会交叉混合；第三从施工人员来看，施工者主要是当地的工匠，语言交流上的不方便，可能会出现意思领会错误，产生变体。同时，在建造过程中受当地风俗的影响，部分变更样式，融入地方风格元素，迎合本地人的审美需要。因此，无论哪一种建筑风格，一旦离开了自身的生长环境，进入一个新的，与原来完全不同的环境中，都会产生变异，但这种改变不可能与新环境下的建筑形态一致，是两种或多种形式的混合。

从山西近代教堂建筑的实例来看，多种风格杂糅的教堂中(见第四章图片)，以最能表现天主教义的哥特式和罗马风式为主。大多教堂把这两种风格各自与其它风格混合在一起，或者这两种风格混合在一起共同表现出来。以山西南境教区为例，像洪洞马牧天主堂，通过建筑正立面的形式来表现哥特风格，而建筑结构则表现了罗马风式；潞城南天贡天主堂主体的结构是以罗马风式而建的，但正立面带有折衷主义的拜占庭建筑风格；长治黄碾天主堂、霍州南杜壁天主堂，使用带有尖券的元素和小塔表现哥特升腾之势，带有哥特浪漫主义情调。这些混合的西式风格再配上中式传统元素，呈现出中西方的多元建筑表现。

^① 陈志华，外国建筑史（19世纪末叶以前）（第二版），第156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年6月。

5.2 功能布局的比较

5.2.1 整体布局

西方教堂多为单体布局，教堂本身、教堂前的广场和村镇、城市关系紧密，注重空间的围合，像圣彼得教堂。宗教与现实生活融为一体，人们可以在广场上游戏、约会、交易、歌舞。教堂与周围的环境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空间。另外，神父的生活与教堂是分离的。



图 5-2 教堂大门

Figure 5-2 The Gate of Church

从大量山西近代教堂的实例来看，与西方单体建筑布局不同，山西近代教堂建筑一般都带有附属建筑，成为一组建筑群。整个建筑群呈围合之势，教堂位于内部，与周边其他的建筑相互隔离，一般教堂不会直接面对街道或开阔地，这可能与早期清政府对天主教活动管理甚严有关。教堂前有一座中国式的院门（图 5-2），有“教务府”字样，这

与传统的中国寺庙有相似之处。穿越过渡空间——不大的院落，进入教堂，高大的教堂封闭在低矮的附属用房内，在近距离观察时，一般不易惹人注目；远处观望时，只有突出的钟塔被掩映在树木与房屋之间。与西方不同，神父一般就住在教堂后部，像霍州的南杜壁天主堂，教堂后部半圆形的圣坛连接一道向上的斜坡，直达后院的平房——神父的住宅。

由此看来，建筑群有明显的轴线关系，借鉴了山西地区传统住宅合院的布局原则，使用功能随宗教观念而发生了改变，中心位置由厅堂、正房替代为教堂、神父住房，划分出教会的尊卑等级关系，其它附属建筑对称布置。但因为教堂东西向的西方宗教布局的特征，打破了固有的场所秩序，建筑关系灵活处理，表现为，一方面教堂不一定在庭院中心。有的教堂位于院落一侧，附属用房集中放在另外一侧，像阪寺山圣母堂（图 5-3）。另一方面，有的教堂外部的庭院空间努力营造西式情趣，如设计了西方风格的圆形鱼池、规整方正的园艺花木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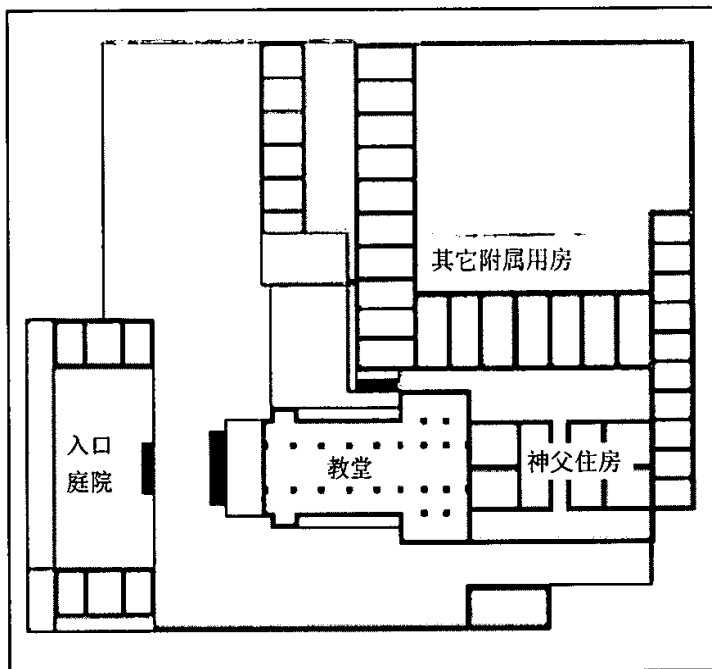


图 5-3 阪寺山圣母堂总平面
Figure 5-3 Plan of Bansishan Church

5.2.2 单体布局

(1) 平面型制

传入山西的西方教堂的主要平面形式是“巴西利卡”矩形和拉丁十字，这是天主教会规定的正统教堂型制。

“巴西利卡”是一种长方形的教堂平面形式。其特点在于主体建筑为一长方形大厅，大厅被两排柱子纵向划分为一个中厅和左右的侧廊，中厅比侧廊宽，而且也更高。教徒把厅称为舱，因为基督教宣扬信徒们要同舟共济、互相关爱。中厅是教徒做礼拜的地方。中厅末端为半圆形圣殿，圣殿上部为拱形圆顶，两侧有忏悔室、告解室等。祭坛设于圣殿前沿。教堂主入口设在正对圣殿的山墙面，门前有一个露天庭院。

拉丁十字的平面是在巴西利卡的基础上发展来的。在祭坛前增建了一道横向的空间，高度和宽度与正厅对应，于是，形成了东西长，南北短的形式。“十”字具有象征含义：在古代，十字架是一种残酷的刑具，耶稣受难于此而成为基督教的标志，另外它还代表太阳、光明的意义，符合教徒对“上帝之光”的追求。拉丁十字既能满足教堂宗教仪式的需要，又满足了教徒精神上的需求，因而成为教堂的正统平面形式。这种拉丁

十字平面的教堂亦被比喻为人体,后堂象征人的大脑,它作为圣坛代表着基督圣灵的精神性空间,而教堂的其余部分,则代表着世俗世界的物质性空间。^①

山西近代教堂建筑中,一些小型的教堂大多采用巴西利卡的长方形的平面,因为这种平面规矩、方正,更容易与传统的木构架相结合,满足空间要求,如新绛坡里天主堂、洪洞韩罗堰圣母堂、长治黄碾天主堂就是这样。

一些教堂采用拉丁十字的平面,但各有不同的十字表现。如新绛天主堂平面,十字的短边伸出不多,伸出的空间被墙面与主体大厅隔开,从内部看,祭坛前的横向空间基本不明显,而被隔开的空间一边被用于小型祈祷堂,一边做成二层开敞的唱诗席位,中厅末端没有半圆形圣殿,做成水平外墙,其两端却各突出多边形空间(图5-4),这种变化了的十字极有特点;如南天贡教堂在中厅末端的半圆形圣殿两侧增加横向独立空间,来表现十字的短边。另外,一些教堂主体两侧有突出的空间,排列有序,用作忏悔室或其它。

无论采用哪种平面型制,山西地区的每个教堂都各有自己的平面特点,由于教堂建筑在形成过程中多种因素的影响,施工者在建造过程中大胆尝试,使简单的教堂平面演化出丰富的空间变化。

(2)建筑朝向

山西近代教堂建筑多数主入口朝西,东西向布局。其实,这种宗教意味很重的东西向平面,并不是所有的当地教徒能够认识到它在西方世界中的意义。在西方,教堂大门



图 5-4 新绛天主堂后部祭坛

Figure5-4 The Chancel of Xinjiang Church



图 5-5 西方教堂的内部

Figure5-5 Interior of The Western Church

^① 王贵祥,东西方的建筑空间——文化、空间图式及历史建筑空间论,第344~359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8年。

朝西，为的是信徒们礼拜的时候面向东方，那里是耶稣基督圣墓的所在。当教徒在中殿圣坛之前拜祭时，可以见到东升的太阳在后堂透过巨大的窗户投入教堂的阳光——上帝之光（图 5-5）。以此为习俗，即便不能朝向西方的教堂，也把正面称为西面。

在山西地区，除了坐东向西的建筑朝向之外，还有一部分教堂尤其是早期的教堂，采用了易于接受的南北向布局，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建筑习俗，如新绛天主堂、长治高家庄村天主堂、潞城南天贡天主堂等就是坐北朝南；另外，有的教堂尽量满足东西朝向，但正面大门却朝东开，完全颠倒了位置，如洪洞马牧天主堂、太原圪燎沟天主堂就是例证，这可能与地理环境位置的限制有关，也可能是当地人的传统习惯造成的。

(3)教堂内部空间

教堂是教徒集会的场所，是使他们心灵得到慰藉、与上天交流思想的地方，建筑场所本身需要营造出神秘、安宁、引人敬畏的信仰空间，体现礼拜精神的庄严和力量。这是宗教赋予教堂的功能，也是中西方教堂都要表现的精神。在山西天主教堂中，大量西方文化渗透到建筑内部造型空间中，体现在不同的建筑部位，所以山西天主教堂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文化内涵。但不同的文化对于宗教意义有不同的领悟，而不同的结构体系也限制了空间内容的表现。

西方教堂的内部空间（图 5-5）利用光和阴影，创造出神秘空间气氛，自身的结构又使得教堂的中厅高而直，狭长而封闭，与世隔绝，在教堂



图 5-6 马牧天主教堂内部
Figure5-6 Interior of Mamu Church

中人们感受到压抑、忧郁，束缚，暖融融的阳光滤过窗格，洒入教堂的空间，才能些许冲淡幽怨的阴影。山西天主教堂保留了西方教堂内部空间的模式，三廊式的大厅通过摇曳的烛光导向中心祭坛，突出其重要地位。尽管山西教堂与西方教堂有一致的界定空间，但是，山西教堂的结构没有使用西方的飞券支撑技术，建筑高度上有所限制，此外，柱间距多数使用了 4 米左右的开间，所以表现在内部（图 5-6）的高宽比例更趋近于人性化，简单的柱式带有地方化的特点，底层空间连续开窗，内部装饰带有传统精神，所有这些蕴含着中式的情节，方正平和的建筑空间减淡了天主教堂浓重的宗教氛围。山西天

主教堂的空间处理手法也与一定时期社会背景有关，在战乱不安的年代，人们只能追求内心的安宁，而这种感觉寄予在教堂的空间上，多少能让人们获得暂时的平静。

5.3 外貌结构特征的比较

5.3.1 外貌特征

(1) 立面造型

山西天主教堂的立面形式融合了西方教堂与当地传统的建筑风格，在不同时段，有不同的融合方式，从教堂立面构图的比例和各种建筑元素的组合方式表现出来。

山西教堂中有一部分较忠实的遵循了西方教堂立面的基本构图方式：立面竖向分成三段，横向分成三层或二层，突出中心部分，底层设三扇尖券或圆券门，表示“三位一体”的天主，上有圆形花窗，顶部置十字架，两侧建造对称的钟塔。大多教堂的立面经过当地工匠的继承与创新，他们结合既有的传统元素与外来的形式，摸索出两者的融合方式，创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教堂立面造型。其一，立面顶部的处理。西方教堂的正立面一般以尖顶结束，而中国人习惯水平线的构图，为了解缓教堂向上的动势，采用了几种不同的手法：把三角山墙直接转化成水平展开的曲线，与巴洛克的涡旋有异曲同工之处（图 5-7-1）；把屋顶与三角山墙结合起来（图 5-7-2），增加平滑之美；把三角山墙的尖部处理为圆滑的弧线（图 5-7-3），弱化尖角的矛盾。其二，利用中国文化装饰。西方教堂一般使用人物形态雕塑丰富立面，传达宗教文



图 5-7-1 立面顶部形式一

Figure 5-7-1 The Top Form of Church's Facade



图 5-7-2 立面顶部形式二

Figure 5-7-2 The Top Form of Church's Facade



图 5-7-3 立面顶部形式三

Figure 5-7-3 The Top Form of Church's Facade

化，而山西教堂吸收了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匾、楹联装饰大门，通过文字表意。（图 5-19-1）其三，钟楼造型的处理。钟楼在西方教堂建筑中有重要地位，是为纪念圣母玛利亚诞生耶稣而建的。山西天主教堂大多把钟楼放在入口立面处，左右对称放置或正中设置，多数钟楼带有西式风格特征（图 5-8），有的钟楼造型优美，类似中国式的小亭（图 5-7-1），配以镂空装饰。

还应该提到的一点是建筑的基础，西方建筑的基础是隐蔽不露或降低到不引人注意的高度，而中国建筑的基础是重点要素。山西教堂中，规模体量较大的建筑都会用带多层台阶的平台突出基础的造型功能，如新绛天主教堂，台阶两边还放置一对石羊，很有地方特点。



图 5-8 西式钟楼

Figure 5-8

The Belfry of The Western Style

(2)外部元素

建筑空间的外部构件中，垂直限定空间的墙壁与水平划分空间的屋顶直接反映建筑的外部形象，其使用的结构体系影响外部形体的变化。

• 屋顶形式

发展成熟的中国传统建筑一直把屋顶放在建筑的首要位置，屋顶的功能不仅是遮挡和防护，而更多的是代表建筑的地位、等级，由此来表现拥有建筑的人的尊卑等级。西方教堂建筑则正好相反，尽可能降低屋顶在造型中的重要性，用延伸墙面和柱式的方式淡化屋顶的造型。山西天主教堂在引入西式教堂的过程中，延续了中国式屋顶形式，用



图 5-9-1 屋顶形式一

Figure 5-9-1 The Roof Form of Church



图 5-9-2 屋顶形式二

Figure 5-9-2 The Roof Form of Church

于教堂正立面的后部主体部分,到本土化运动时期,则直接把屋顶形式表现在正立面上。

教堂主体的屋顶随长方形中厅的形式而采用两坡顶(图 5-9-1),后部突出的圣殿采用类似攒尖顶(图 5-9-2),与中厅屋顶不在同一平面,教堂若有侧廊,使用单面斜坡覆盖,呈现出不同的组合屋顶形式,将建筑的使用功能通过屋顶形式与外观造型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图 5-10-1 屋顶檐口一
Figure5-10-1 The Eaves' Form



图 5-10-2 屋顶檐口二
Figure5-10-2 The Eaves' Form

大多数教堂的屋顶檐口出挑浅,为了能达到檐口与墙体的良好结合,不使教堂显得突兀,一种做法就是采用与墙体之间多层线脚作为过渡(图 5-10-1),这与西方教堂的处理方法一样,但这种做法会使檐口感觉很厚重,所以,不同体形的教堂,线脚与檐口的比例不同,尺度的把握很重要,山西教堂不乏优秀的实例;另一种做法就是在出挑的檐口下部的墙体上使用类似装饰斗拱的替代装饰(图 5-10-2),连续重复出现的这种元素,增加了教堂的中式风格。

• 外墙形式

展示建筑的外部形象要通过墙面材料的形状、尺寸、质感、色彩、局部装饰等共同



图 5-11-1 外墙形式一
Figure5-11-1 The Wall's Form



图 5-11-2 外墙形式二
Figure5-11-2 The Wall's Form

合成。山西天主教堂大体仿照了西方建筑的墙体形态，但在这些合成元素上有不同的表现手法，不同于西方教堂的视觉感受。大多山西教堂的墙体被壁柱竖向划分(图 5-11-1)，分成均匀的开间，墙体上顺序开窗，窗户大小根据墙体受力情况而定，墙体底部做抹灰，起装饰兼防水的作用。有的教堂墙体除此之外还被水平划分(图 5-11-2)，以窗沿线或腰线划分为上下二段。另外，墙体外突的小空间也为整个墙体形象增色不少。

教堂的墙体材料一般是青砖，裸露的面砖保持本色，一般不做色彩处理。为了仿照西式的圆弧造型，按照砖的位置烧制了弧形、半圆形青砖，充分发挥了烧制工艺，这些砖砌成外观光滑弧形墙，圆形壁柱，砖与砖之间灰浆粘合，严丝合缝，线条流畅，即使壁柱上的细小的线脚也层次清晰，显示了工匠的高超技艺。

5.3.2 结构特征

建筑外貌形体与结构相辅相成，互相影响。山西天主教堂接受了建筑入口在山墙这种建造方法，必然要调整建筑结构与之相配。本地以木构架作为房屋骨架，墙体不承重的传统结构不能满足教堂的大体量，所以大多数山西教堂没有采用，而是借鉴了西方教堂的建造结构。中世纪之初，西欧教堂普遍使用木屋架结构，随后拱券技术才渐渐传播开，由罗马风建筑的筒形拱、十字拱到哥特建筑的纯正骨架券、飞券。这些建造技术、结构体系部分被山西天主教堂吸收，并结合当地的技术水平有所变化。

山西的教堂建筑主要采用的结构大体为两种：一种是砖墙木屋架的结构体系，即砖木混合结构；一种是两个以直角交叉的筒形拱呈现的十字拱结构。

砖木混合结构是山西教堂普遍采用的结构体系，就是采用西式的三角屋架加砖石墙体，这种屋架与传统的中式木结构在受力上有所不同，前者是三角形稳定性的原理，而后者是垂直方向上的渐次平衡传力。两者比较西式的三角屋架受力较好，也节省了材料。建筑实例有洪洞韩罗堰和庄园天主堂、榆次天主堂等，建筑体量跨度较大



图 5-12 南天贡天主堂十字拱顶

Figure 5-12

The Vaulting of Natiangong Church

的教堂还在室内增加了木柱或石柱，太原天主总堂、太原圪燎沟天主堂等就采用了这种结构。由于砖木结构的墙作为承重构件，所以建筑墙体一般很厚。

十字拱结构是中世纪的古董技术，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木结构，但窑洞的拱顶与筒形拱的原理相似，当地工匠就很容易理解交叉的筒形拱呈现的十字拱结构的原理，所以这种结构使用在一些跨度较大的教堂上，如洪洞马牧天主堂、潞城南天贡天主堂（图 5-12）、新绛天主堂、汾阳天主堂等。

在带有哥特风格的教堂建筑中，由于没有采用相应的结构体系，哥特建筑的典型构件——飞扶壁，教堂的高度并没有达到超出人想象的程度。这一极具造型魅力的构件在山西天主教建筑中为什么没有被采用？笔者认为，一方面文化观念的差异，使这种暴露在外特殊构件难以让人接受，建造工匠就不会重视这种技术；一方面山西教堂建筑都是用砖来模仿西方的石头建筑，那种凌空欲飞的飞扶壁（图 5-13）具有结构和施工的难度，很难在建筑中实现。因此要使



图 5-13 飞扶壁

Figure 5-13 Flying Buttress



图 5-14 外墙扶壁

Figure 5-14 Buttress of Wall

教堂达到较高的高度，只有加厚墙体，由于教堂的墙是承重构件，本身已经很厚。所以山西天主教堂多在侧廊中采用与中厅落差不大的做法，并用中国式的坡屋面侧廊作为抵抗中厅的支撑，而侧廊部分又用逐段加厚外墙扶壁（图 5-14）来加固。这种方法要消耗大量材料，建筑高度自然会受到限制，因此在尺度上，山西教堂比西方教堂逊色许多。

5.4 细部和装饰的比较

5.4.1 细部处理

山西教堂建筑借助细部表现将传统的建筑形式和材料赋予宗教要求和意义，有目的的融入教徒的心理。

(1)柱

柱，作为承重传力构件，也有美观装饰作用。山西教堂的柱子形式有单柱和壁柱二种，分为圆柱、方柱、束柱形状（图 5-15），都不同程度的吸收了西方柱式的一些做法。

柱子分为柱头、柱身、柱

础三部分。柱头部分对科林斯、多立克等柱头都有所应用，但又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简单形体，如洪洞马牧天主堂的柱子（图 5-16-1），柱头上没有图案，只是简单的由圆体与方体结合；二是抽象形体，如南天贡天主堂的柱子（图 5-16-2），碗形的柱头上部叠加多边形柱帽，外部刻有花草浅浮雕，由于比例推敲不够，柱身与柱头衔接不够自然，破坏了柱子的整体感觉。三是复杂形体，如太原天主堂的壁柱柱头（图 5-16-3）

是植物卷草藤蔓，汾阳天主堂则把十字与花纹结合，增加了宗教性质。柱身部分以砖柱和石柱为多，一般周身圆润，不加雕刻，也有的方石柱在柱身四面做几何浮雕纹饰。柱础（图 5-17）部分大多简单，由几层厚薄相间的线脚构成。柱子底部有基座（图 5-17），造型方正，有的刻图案花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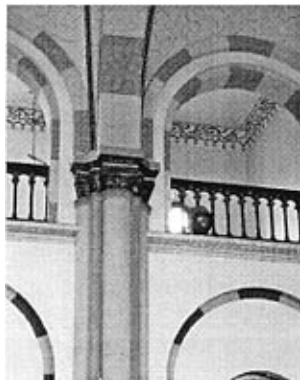


图 5-15 束柱
Figure5-15Column



图 5-16-1 柱头一
Figure5-16-1Capital



图 5-16-2 柱头二
Figure5-16-2Capit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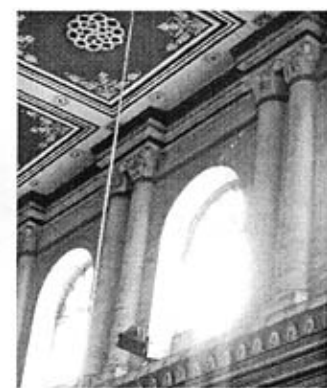


图 5-16-3 柱头三
Figure5-16-3Capital

(2)门、窗

教堂的门窗大量采用拱券形式，这种从西方建筑中引入的形式在山西当地也有类似的技术手法，所以，工匠很容易理解和接受拱券的做法，并且十分熟练的应用到各地教

堂。天主教堂的拱券种类有半圆拱券、弧形拱券、双圆心尖拱券、尖三叶拱（图 5-18）等。

拱券式的教堂大门，配以风格不同的装饰表现出各种样式的大门。一种是利用哥特风格的逐层深入的壁柱（图 5-19-1,2），即透视门，突出大门的地位；一种是大门上置三角装饰墙（图 5-19-3,4），这两种用于规模较大的教堂或教堂正立面的入口，一般的教堂大门虽然形式简单，但配有线条装饰，仍然很别致。

窗户形式有表现哥特式的组合窗（图 5-20-1,2）和玫瑰圆窗（图 5-21），组合窗由二个联排尖券或半圆券窗顶着一个玫瑰圆窗组成。玫瑰圆窗经过简化变异，演绎出多样形式，富有地方特点。形式较简单的半圆券或尖券窗重点表现窗棂花样（图 5-22-1,2），有菱格、井字格等传统纹样。



图 5-18 尖三叶拱
Figure 5-18 Arch



图 5-17 柱础和基座
Figure 5-17 Plinth



图 5-19-1 入口大门一
Figure 5-19-1 Entrance



图 5-19-2 入口大门二
Figure 5-19-2 Entrance



图 5-19-3 入口大门三
Figure 5-19-3 Entrance



图 5-19-4 入口大门四
Figure 5-19-4 Entrance



图 5-20-1 组合窗一
Figure5-20-1Wind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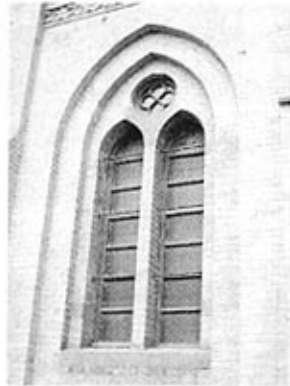


图 5-20-2 组合窗二
Figure5-20-2Wind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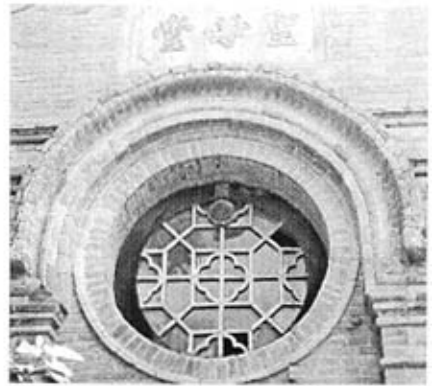


图 5-21 玫瑰圆窗
Figure5-21Rose Window



图 5-22-1 窗棂一
Figure5-22-1Window



图 5-22-2 窗棂二
Figure5-22-2Window

(3)顶棚

教堂的顶棚有两种形式，平顶和十字拱形顶。教堂的平顶天花上一般使用浅浮雕与绘画相结合的方式做装饰，如太原主教堂(图 5-23)，中厅天花是重复的方正构图，侧廊顶是表现宗教故事的浅浮雕式绘画；十字拱顶就是建筑十字拱的结构直接暴露出来，在形成的十字上和拱与拱的连接处上饰以色彩加



图 5-23 中厅天花
Figure5-23Ceiling of Nave

重结构，产生韵律的美感。

在其他细部处理上也能反映地方的传统特色和传统技术与西方建筑风格的结合，如建筑内部的空气流通，使用传统的老虎窗（图 5-24-1,2）和通气窗孔（图 5-25-1,2,3），建筑墙体的通气窗孔设计巧妙，与雕刻的花形或象形纹饰自然结合在一起。此外，屋面的排水口（图 5-26）采用了传统的形式。



图 5-24-1 老虎窗一
Figure5-24-1
Window of Ventilation



图 5-24-2 老虎窗二
Figure5-24-2
Window of Ventil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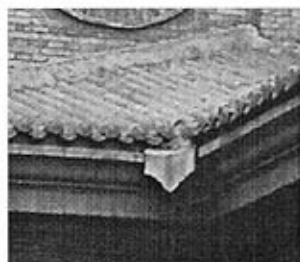


图 5-26 排水构件
Figure5-26
Component of Drains



图 5-25-1 通气孔一
Figure5-25-1 Ventilat



图 5-25-2 通气孔二
Figure5-25-2 Ventilat



图 5-25-3 通气孔三
Figure5-25-3 Ventilat

5. 4. 2 装饰特征

山西教堂建筑的装饰图案丰富多样，有中式传统图案，西式的纹样，最能表现中西融合特点的就是工匠借助地方传统纹样，并结合反映天主教义的拉丁花押字母，组合成具有明显识别性的宗教装饰图案，这些装饰图案交织在一起，产生特殊的装饰效果。



图 5-27 中式装饰纹样
Figure5-27 Decoration of Chinese Style

传统中式纹样主要是几何、自然图案，有花瓣、万字、宝顶等图案还有水浪纹、云形纹等纹式（图 5-27）。西式的卷草纹应用较多，但有的经过变形处理，与中式牡丹石榴纹相似。拉丁花押字母是西方拉丁字母组合成的图样，有很强的宗教意义，应用到山西教堂上时，有的直接照搬过来（图 5-28-1），有的则结合中式纹样构图（图 5-28-2），出现新的构图原则。



图 5-28-2 中西结合装饰
Figure5-28-2
Decoration of Combined Style



图 5-28-1 西式装饰
注意中间的拉丁花押字母
Figure5-28-1
Decoration of The Western Style

在教堂的装饰中，西方的教堂建筑从内而外都极大的表现了实体形态艺术，雕像和绘画艺术占有绝大多数的比例，有时无法肯定建筑与雕塑绘画的所属关系。而山西教堂建筑没有繁多的雕像绘画，建筑外立面大多采用浮雕的装饰手段，注重表现的是自然与宗教的关系。室内装饰使用壁画、彩漆或配以浮雕共同表现，有的把实用物件与雕刻结合在一起，十分巧妙（图 5-29）。山西天主教堂的装饰没有一定的规范，有的教堂在立面上过多的堆砌装饰图案，失掉了整体的构图效果；而一些小教堂风格简洁，恰当的装饰使建筑更具魅力。



图 5-29 盛放圣水的物件
Figure5-29 Component

5.5 小结

本章从建筑风格、功能布局、外貌结构、细部装饰四个方面对比了山西天主堂与西方教堂的异同，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山西近代天主教堂借鉴、消化、吸收了西方传统教

堂特征要素，形成自身独特的建筑特色，从中西对比角度来看，形成山西教堂的特征有以下四点原因：

其一，审美观念的差别。中国传统观念中，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意境之美，而西方的观念中崇尚的是征服自然的力量，强调真实的美，中西不同的审美取向，形成不同的性格特性，前者节制，收敛，后者挑战、探索。中西审美观念的不同必然产生不同的建筑形式。中国传统的建筑讲究虚实的空间布局，表现封闭、向心、围合，建筑对自然本着尊重、适应、屈从的态度，西方建筑重视实体形的处理，表现开放、扩张。两种相对的观念相遇时，必然产生对抗调和矛盾。山西教堂在形成过程中，就是在不断的平衡两者的关系，而这两种观念也不断的相互了解、相互适应。

其二，对建筑认识的差别。在中国人看来，建筑除实用外，还是表现尊卑等级工具，道德制度的体现。而西方建筑作为人类智慧和力量的体现，是人类最高技艺的代表。山西天主教堂建筑一方面要体现高大神圣的地位，一方面又有传统思想的影响，所以，取其中庸，形成了可以让当地人接受的造型。

其三，建筑技术和材料的差别。西方的教堂使用几多变化的拱券技术结构，以石材为主要建造原料，而中国建筑以木构为主体结构，配以砖材。山西教堂结合了两者的，形成了独特的中西结合的结构形式。

最后，设计施工人员专业程度的差别。西方建筑都是由博学多才的专业建筑师设计督建，而且有较为科学完善的建造体系；中国建筑是由工匠建造施工，一般是凭借多年的经验积累，没有系统的建筑理论指导。地方工匠建造山西教堂时靠神父讲解，自己摸索，不免受理论和认识的约束，而使建造水平参差不齐，呈现形态各异的教堂建筑。

综上所述，山西天主教堂建筑中西融合的特点，是中西方建筑相互碰撞融合中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建筑造型。

结 语

回顾全文,基本把整个山西天主教的发展和南境教区近代天主教堂建筑的发展梳理了一遍,总结出山西近代天主教堂建筑的整体特点,通过中西天主教堂的比较,明确了山西教堂建筑的特征形态。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使纵向发展的中国传统建筑的稳定体系受到西方文化的横向冲击,逐步走向以中西交融,多种建筑形态并存为特点的建筑近代化。随着西方天主教深入中国内地,带有西方宗教性质的教堂建筑随即出现。内陆山西地区,在近代时期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建筑类型,到近代时期,不纯正的西式教堂大规模出现。这种外来的建筑在地方建筑循环发展的封闭环境中开始生根,发芽,但是当地传统对它的怀疑和排斥,使其生长过程缓慢、不稳定,甚至变异。

良好的文化交流应该是建立在平等开放的基础上,而鸦片战争后的传教主要是以经济掠夺为目的、带政治化使命特征的侵略活动,以武力支持的传教导致双方地位的不平等。西方文化向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必然产生对抗。这种矛盾和冲突的中西交流最终导致了山西天主教堂建筑发展的不稳定。从西式建筑一开始出现,中国人就把它看作是不可理喻、违背常理的,除了建筑表象因素,根本而言,在骄傲的国人眼中没有比自己更好的建筑。由此,虽然较早就有了西式教堂,但它对社会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近代时期,在西方的侵略下,人们为抵抗外辱,以一种抗拒的态度来对待外来建筑,呈现出非正统西方模式的中国教堂建筑,异化成另类的中西结合的式样。

山西天主教堂建筑归根结底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异质而引起的排他性。它的价值和魅力通过中西交流、融合表现出来。

从历史角度来讲,近代时期是西方殖民扩张的时期,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开始时期。山西教堂建筑所表现出的中西交融的典型特征,说明中西两种不同源的、甚至在某些方面对立的文化,能够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并且呈现出良好的共生趋势,虽然这一结合的过程曲折,带有冲突甚至血腥的记忆,但是中西融合带来了更多的好处,中国不再封闭自恋,而是以积极的态度应对接受、营养自身的需求。近代时期,随着教堂进入山西,在地方民宅、商铺和一些公共建筑上渐渐出现了西方建筑样式,教堂建筑拉开了山西的中西交流的序幕。

从艺术角度来讲,单一的直线形艺术发展不可能出现新鲜的艺术形态,只有不同的多种艺术交流交叉才能产生有生命的血液。山西教堂建筑正是中西艺术交流的成果。它带来西方经典的古代建筑文化——成熟稳重的罗马风建筑、高大挺拔的哥特风格、奇特夸张的巴洛克艺术,展示出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艺术风格,使地方工匠也因异域风格的冲击而焕发了创作意识,把地方建筑的优秀手法塑造在西方艺术中,诠释出另类的建筑形态,虽然这种形态发展不尽成熟、不够完善,但它却是一个新的艺术形式,为中国建筑艺术注入了新的生机。

从技术角度来讲,没有建造技术水平的进步,就不可能出现新的建筑形式。千年的中国建筑一直传承着古老的建筑形式,桎梏于木结构的建造技术中,尽管不断的改进发展,但从根本上没有突破本源。西方教堂建筑却展现了西方社会的最新技术,每一次的技术创新都会体现在教堂建筑上,所以教堂建筑的形式也在不断的变化。山西的教堂建筑是展示西方建造技术的窗口,虽然它并没有完全接纳下来,根据自身的技术水平有目的的结合了中西结构技术的相似性,形成独特的地方教堂建筑,但是教堂主体空间采用的拱形结构是山西地区大跨度、无内柱建筑的早期优秀的中西结合的实例,为山西地区大跨建筑提供了参考与经验。

中西融合的山西近代天主教堂建筑所具有的这些价值和魅力使它成为中国近代建筑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研究山西教堂建筑不仅可以梳理它的发展过程,了解它的整体特点,还可以从中挖掘出某些被遗忘的建筑理念,为迷失传统的现代建筑提供历史延续,为塑造出表现地方风貌的新建筑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第四十六卷,中华书局,1997
2. 乔志强主编,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史》,中华书局,1997
3. 刘泽民等主编,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史(近代卷卷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
4.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5.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6.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中、下)》,中华书局,1988
7. 新绛县志编撰委员会,《新绛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11
8. 山西省潞城市志编撰委员会,《潞城市志》,中华书局,1999,5
9. 陈志华,《外国建筑史(19世纪末叶以前,第二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6
10. 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0,10
11. 何兆武,《中西文化交流史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10
12. 陈志华,《外国古建筑二十讲》,三联书店,2002
13. 马良等,《天主教长治教区简史(内部资料)》,教友生活编辑部,1997,12
14. [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与基督教——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5. 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4
16. 余东升,《中西建筑美学比较研究》,华中理工大学,1992,7
17. [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和基督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8. [德]汉斯·埃里希·库巴赫著,许丽军译,《罗马风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
19. [苏]勃里托娃等著,严摩罕译,《希腊罗马美术》,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
20. [比]格里森著,董黎译,《中国的建筑艺术》,华中建筑,1997,04, vol.15, p123-127
21. 黄一农,《明清天主教在山西绛州的发展及其反弹——兼论西学、西教的传播网络》,明末以来中西文化交汇研讨会论文,1996
22. 杨秉德,《早期西方建筑对中国近代建筑产生影响的三条渠道》,华中建筑,2005,

- 01, vol.23, p159-163
23. 张厚斌,《教堂的起源及演进》,重庆建筑大学学报,1998,10,Vol.20,No.4,p64-67
24. 杨嵩林,《中国近代建筑的形成和发展》(上、中、下),四川建筑,1995,02、05、08, vol.15, No.1,2,3, p7-10,p8-11,p15-18
25. 黄险峰,《中西建筑文化差异之比较的探讨》,华中建筑,2003,05,Vo21,p35-37
26. Cook, Lawrence,《Solar Concepts in Church Design.》,Construction Specifier, v 40, n 3, Mar, 1987, p 64-68, 71-73
27. Carvalho, Antonic Pedro O.《Objective acoustical analysis of room acoustic measurements in Portuguese Catholic churches》,Proceedings - National Conference on Noise Control Engineering, Progress in Noise Control for Industry, 1994, p 805-810
28. Pollock, Jeff,《Geology of the Roman Catholic Basilica of St. John the Baptist, St. John's, Newfoundland》, Geoscience Canada, v 31, n 1, March, 2004, p 1-10
29. Kenneth Frampton,《Modern Architecture: a critical history》, London,1998
30. Borges, R.F,《Analysis of historical buildings: San Jose Church, San Juan, Puerto Rico》, Advances in Architecture International Series, v 3, 1997, p 159-167
31. David Warkin,《A History of Western Architecture》,U.S.A, 1986
32. Theodossopoulos, D. Sinha, B.P., Usmani, A.S.《Case study of the failure of a cross vault: Church of Holyrood Abbey》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v 9, n 3, September, 2003, p 109-117
33. Calarco, A. Cammarata, G.; Loddo, C.; Tripodi, D.《The acoustic project of St Maria of Savoca in the plan of recovery of the former church》, Acta Acustica (Stuttgart), v 89, n SUPP., May/June, 2003, p 103
34. Michael Rae burn,《Architecture of the Western World》,London,1980
35. Tidafi, T. Booth, D.W.《Architectural simulation by modeling procedures: The creation of the Church of Saint-Eustache in Paris》, Advances in Architecture International Series, v 3, 1997, p 149-157

插图目录

第二章

图 2—1 山西太原教区的各式教堂——依次是太原天主堂，太原圪窰沟天主堂，板寺山圣母堂，洞儿沟路德圣母堂（此图片为太原天主总堂提供）

图 2—2 清末山西南境教区图

第三章

图 3—1 太原早期天主堂——建于 1870 年，1900 年被毁（太原天主总堂提供）

图 3—2 原东雍书院的入口大门

图 3—3 板寺山天主堂建筑群

图 3—4 建于 1905 年的太原主教座堂（太原天主总堂提供）

图 3—5 总堂神父大楼内院

图 3—6 黄崖天主堂（临汾天主堂提供）

第四章

图 4—1 长治高家庄天主堂后部

图 4—2 长治高家庄天主堂正立面

图 4—3 潞城南天贡天主堂平面测绘图

图 4—4 潞城南天贡天主堂正立面

图 4—5 长治马厂天主堂钟楼

图 4—6 长治马厂天主堂正立面

图 4—7 长治羌城天主堂

图 4—8 洪洞韩罗堰圣母堂

图 4—9 长治黄碾天主堂

图 4—10 霍县南杜壁天主堂

图 4—11 洪洞马牧天主堂

图 4—12 新绛安道教堂平面测绘图

图 4—13 新绛安道教堂教堂内部

图 4—14 新绛安道教堂正立面

图 4—15 洪洞庄园村路德圣母堂

图 4—16 洪洞修道院天主堂照片（洪洞修道院提供）

图 4—17 新绛坡里圣母堂

第五章

图 5—1—1 罗马风式教堂建筑——意大利比萨教堂（张柏《世界著名教堂》）

图 5—1—2 哥特式教堂建筑——法国沙特尔主教堂（张柏《世界著名教堂》）

图 5—2 教堂大门——霍县南杜壁天主堂大门

图 5—3 阪寺山圣母堂总平面图

图 5—4 新绛天主堂后部祭坛

图 5—5 西方教堂的内部——乐托达姆修道院内部（张柏《世界著名教堂》）

图 5—6 马牧天主教堂内部

图 5—7—1 立面顶部形式一——洪洞韩罗堰圣母堂立面顶部

图 5—7—2 立面顶部形式二——长治羌城天主堂立面顶部

图 5—7—3 立面顶部形式三——汾阳天主堂立面顶部

图 5—8 西式钟楼——霍县南杜壁天主堂钟楼

图 5—9—1 屋顶形式一——潞城南天贡天主堂屋顶形式

图 5—9—2 屋顶形式二——霍县南杜壁天主堂屋顶形式

图 5—10—1 屋顶檐口一——新绛安道教堂屋顶檐口

图 5—10—2 屋顶檐口二——汾阳天主堂屋顶檐口

图 5—11—1 外墙形式一——长治马厂天主堂外墙形式

图 5—11—2 外墙形式二——洪洞马牧天主堂外墙形式

图 5—12 南天贡天主堂十字拱顶

图 5—13 飞扶壁——拉多尼教堂飞扶壁（张柏《世界著名教堂》）

图 5—14 外墙扶壁——新绛安道教堂外墙扶壁

图 5—15 束柱——新绛安道教堂束柱

图 5—16—1 柱头一——长治马厂天主堂柱头

图 5—16—2 柱头二——潞城南天贡天主堂柱头

图 5—16—3 柱头三——太原天主堂壁柱柱头

图 5—17 柱础和基座——潞城南天贡天主堂柱础和基座

- 图 5—18 尖三叶拱——洪洞庄园村路德圣母堂大门
- 图 5—19—1 入口大门一——潞城南天贡天主堂入口大门
- 图 5—19—2 入口大门二——新绛坡里圣母堂入口大门
- 图 5—19—3 入口大门三——新绛安道教堂入口大门
- 图 5—19—4 入口大门四——长治马厂天主堂入口大门
- 图 5—20—1 组合窗一——潞城南天贡天主堂组合窗
- 图 5—20—2 组合窗二——新绛坡里圣母堂组合窗
- 图 5—21 玫瑰圆窗——洪洞韩罗堰圣母堂玫瑰圆窗
- 图 5—22—1 窗棂一——长治黄碾天主堂窗棂
- 图 5—22—1 窗棂二——汾阳天主堂窗棂
- 图 5—23 中厅天花——太原天主堂中厅天花
- 图 5—24—1 老虎窗一——霍县南杜壁天主堂老虎窗
- 图 5—24—2 老虎窗二——新绛安道教堂老虎窗
- 图 5—25—1,2 通气孔一、二——霍县南杜壁天主堂通气孔
- 图 5—25—3 通气孔三——汾阳天主堂通气孔
- 图 5—26 排水构件——长治马厂天主堂滴水瓦当
- 图 5—27 中式装饰纹样——新绛安道教堂立面三角山墙处
- 图 5—28—1 西式装饰——阪寺山圣母堂立面三角山墙处
- 图 5—28—2 中西结合装饰——潞城南天贡天主堂立面处
- 图 5—29 盛放圣水的物件——潞城南天贡天主堂内部靠入口处

注：除注明资料来源外的图片，其余图片和测绘图均为作者拍摄和绘制。

致 谢

在论文即将结束之际，一丝欣慰与许多感想浮上心头。回顾这半年的论文工作，辛劳的调研与枯燥的资料查阅浸润于字里行间，化作奋笔疾书后的快感和愉悦，让我时时不能忘怀。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王瑛教授，本文选题开始，导师就反复叮咛要深入调查，广泛收集资料。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导师更是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在论文大局的把握上，具体要点的深入上，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师从先生的三年，使我受益很大，先生不仅治学严谨、知识广博，而且为人和善，诲人不倦，时常提醒弟子要做好学问就要先学做人，这种言传身教的影响，必然会有益于我今后的人生道路。

衷心感谢我的父母，多年来他们无尽的关怀、帮助和奉献，是我学习的动力和源泉。感谢我的小姨父张小杵和我的表妹程军，在调研中，与我一起日晒辛劳。

感谢我的同窗郭伟、郭晋峰、王春芳，程文娟，和他们相处的日子让我感受到美好的情谊，同时，在资料收集、调研中也给我很大的帮助与支持。

感谢在调研中给与我支持的天主教会的教会人员和教徒信友，谢谢他们热情的讲解与提供的重要资料。

我还要感谢曾经帮助和关心我的所有老师、同学和朋友。

最后，衷心感谢在百忙中抽出时间评阅论文和参加答辩委员会的各位专家、教授！

李 瑾

2006年4月于太原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王瑛 李瑾,《西方文化影响下的太原天主教堂建筑》,太原理工大学学报, 2006.2
- (2)王瑛 李瑾,《山西天主教堂考察纪要》,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第五辑,2006.06